

從《集古錄》銅器銘文的釋讀 談歐陽脩與劉敞、楊元明的交會出新^{*}

沈寶春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

摘要

本文主要探討宋代金文學初始的鈐鍵人物歐陽脩（1007-1072）與劉敞（1019-1068）在銅器銘文釋讀上的交會，並參照楊元明（？-1062？）以窺見洪荒初闢，新猷初綻時的依稀面貌。

關鍵詞：歐陽脩、劉敞、楊元明、集古錄、銅器銘文

^{*} 本文原作〈久接從游共闢新境——從青銅銘文的釋讀談歐陽脩與劉敞〉，曾於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福建師範大學、中國歐陽修研究會、中國古代散文學會主辦之「歐陽修暨宋代散文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經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並加以修正補苴，謹此致謝。

Ouyang Xiu's Encounter with Liu Chang and Yang Yuanming: A Study of Different Transliterations of a Bronze Inscription in *Jigu Lu*

Shen Pao-chu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transliteration of a bronze inscription by three different scholars,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scholarly connections between Ouyang Xiu (歐陽脩, 1007-1072), Liu Chang (劉敞, 1019-1068), and Yang Yuanming (楊元明, ?-1062?), three pioneers of bronze inscription studies in the Song Dynasty. It will reveal a glimpse of this scholarship during its initial stage of development.

Keyword: Ouyang Xiu, Liu Chang, Yang Yuanming, *Jigu Lu*, Bronze Inscription

一 前言

這交會，鑲入了情誼，敘述著理致，《集古錄》著錄的金石碑刻，不正昭告著「地下出土物遇上新興的飽讀三代經典的士大夫」¹的對話，即將孕育出嶄新的領域來。

朱熹說過：「紀錄金石，於古初無，蓋自歐陽文忠公始。」²後來，王國維也在《國朝金文著錄表》序中指出「古器物及古文字之學一盛於宋，而中衰於元明」³，又在《宋代金文著錄表》序中敘說著：

古器之出，蓋無代而蔑有。隋唐以前，其出於郡國山川者，雖頗見於史，然以識之者少，而記之者復不詳，故其文之略存於今者，唯美陽與仲山甫二鼎而已。趙宋以後，古器愈出，秘閣太常既多藏器，士大夫如劉原父、歐陽永叔輩，亦復蒐羅古器徵求墨本，復得楊南仲輩為之攷釋，古文之學博焉。⁴

這段文字約可讓我們瞭解到宋代士大夫接觸、蒐集、釋讀古器物的情況，以及影響後世相當深遠的三人：劉敞（字原父，1019-1068）、歐陽脩（字永叔，1007-1072）的「蒐羅古器徵求墨本」和楊元明（字南仲，？-1062？）⁵的「攷釋」，其對「古文之學博焉」振波起瀾大大地煽起了風潮。這方面的認知也泛及了東亞華文圈，比如日人白川靜認為劉敞《先秦古器記》亡佚後，歐陽脩的《集古錄》對我們了解「金文學」草創之初與發展研究的情況是相當珍貴與重要的資料，而云：「《三館古器圖》、《先秦古器記》亡佚的現在，歐陽氏《跋尾》是能讓我們了解宋代金文學草創期學術的珍貴資料。《集古錄》的編纂釀成了金文學發展的機運，為宋代金文學的成立起了指導作用。……此書把器銘作為古代研究的史料，從歷史的

¹ 陳芳妹：〈導言〉，《青銅器與宋代文化史》（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5月），頁III。

² 〔南宋〕朱熹著，郭濟、尹波點校：〈題歐公〈金石錄序〉真跡〉，《朱熹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卷八十二，頁4214。

³ 王國維、羅福頤編撰：《三代秦漢兩宋（隋唐元附）金文著錄表》（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2003年9月），頁3。

⁴ 王國維、羅福頤編撰：《三代秦漢兩宋（隋唐元附）金文著錄表》，頁627。

⁵ 楊南仲之卒年此處暫依李慧斌說法，詳見李慧斌：〈宋仁宗時期國子監書學楊南仲考述〉，《青島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期，頁70，又見李慧斌：《宋代制度層面的書法史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頁133；李慧斌：《宋代制度視閥中的書法史研究》（海口：南方出版社，2011年11月）。

角度作解釋，採用了歷史學方法。」⁶即從史學的角度來觀察切入，進一步確立其作用和地位的。那麼，如果我們細加追究，難道劉敞僅止於「蒐羅古器」？歐陽脩也只有「徵求墨本」？至於楊元明則有待他來「為之攷釋」嗎？這是行文中的「互見」手法呢？還是當時分工實境的概括？

當然，歐陽脩《集古錄》之所以能取得「金文學發展的機運，為宋代金文學的成立起了指導作用」，其實是跟劉敞的《先秦古器記》脫不了關係的，這在何澤恆《歐陽修之經史學》第三章第一節「集古錄」⁷、顧永新《歐陽修學術研究》第六章〈從歐陽修的交游看其學術淵源及影響〉的第四節〈歐陽修與劉敞交誼考略〉⁸中，已深中肯綮，直擊核心地論略過。至於探討《集古錄》而撰成書者也多，如蔡清和《歐陽脩《集古錄跋尾》之研究——以書學、佛老學、史學為主》、杜娟《歐陽修《集古錄跋尾》研究》、王宏生《北宋書學文獻考論》、梁豔《歐陽修書論研究——以《集古錄跋尾》為中心》、莊清嘉《自適、載道與歎逝：歐陽修《集古錄跋尾》之抒情性》、李憲專《歐陽脩《集古錄跋尾》所記金石碑帖書法之研究》等等⁹；撰成單篇論文者更不乏其人，如：胡光華〈《集古錄》發微〉、余敏輝〈宋代金石學的雙璧——《集古錄》、《金石錄》比較論〉、朱伶傑〈《集古錄跋尾》的編纂及其體現的思想研究〉、孫宗英〈歐陽修《集古錄跋尾》文學內涵發微〉及〈有力之強：論歐陽修集古的物質基礎〉、趙廣青〈歐陽修《集古錄跋尾》所涉及唐代碑刻研究〉、吳旭春〈歐陽修《集古錄跋尾》中的書學思想〉

⁶ 「劉敞・楊南仲らのこれらの銘釋は、歐陽脩の集古錄跋尾によつて傳えられ、考古圖等にも採録された。三館古器圖や先秦古器圖が佚亡したままでは、歐陽氏の跋尾は、宋代金文學のいわば草創期の學術を傳える貴重な資料である。またその集古錄編纂は、當時における金文學の成立に指導的な役割を果たし、その機運を醸成した。從來の彝器觀もここにその面目を改め、古器を瑞器あるいは妖祥とする舊時の觀念は一掃された。そこでは、彝器や器銘を古代研究の史料とし、これを歴史的に系列づけるといふ史學的方法がとられている。」〔日〕白川靜：《金文通釋》5，《白川靜著作集 別卷》（東京：株式會社平凡社，2005年4月），頁61，原載《白鶴美術館誌》第四一輯，第二章，頁61；〔日〕林巳奈夫著，廣瀨薰雄等譯，郭永秉潤文：《殷周青銅器綜覽・第一卷・殷周時代青銅器之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5月），頁7。

⁷ 何澤恆：《歐陽修之經史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80年6月），文史叢刊之五十四，頁183-184。

⁸ 顧永新：《歐陽修學術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8月），頁186-192。

⁹ 蔡清和：《歐陽脩《集古錄跋尾》之研究——以書學、佛老學、史學為主》（嘉義：中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2年）；杜娟：《歐陽修《集古錄跋尾》研究》（濟南：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王宏生：《北宋書學文獻考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3月）；梁豔：《歐陽修書論研究——以《集古錄跋尾》為中心》（長春：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李憲專：《歐陽脩《集古錄跋尾》所記金石碑帖書法之研究》（彰化：明道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5年），又見李憲專：《歐陽脩《集古錄跋尾》所記金石碑帖書法之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8年12月）；莊清嘉：《自適、載道與歎逝：歐陽修《集古錄跋尾》之抒情性》（臺北：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

及〈從《集古錄跋尾》看歐陽修對北宋尚意書家的影響〉、彭國忠〈試論歐陽修《集古錄跋尾》的文學批評價值〉、馬劉鳳〈歐陽修與《集古錄》〉、何如月、何皓月〈《金石錄》和《集古錄》的史料價值〉及〈碑刻文獻在歷史研究中的價值——以《金石錄》和《集古錄》為例〉、楊軍〈從《集古錄跋尾》看歐陽修的書學思想〉、徐學標〈歐陽修《集古錄跋》的書法批評價值〉、顧永新〈《集古錄跋尾》的文獻學考察〉及〈《集古錄》名實考〉、余敏輝〈《集古錄》成書年代辨〉、謝輝〈論《金石錄》對《集古錄》的補正〉、李興祥〈由《集古錄》看歐陽修之治學精神〉……簡直鬱鬱多方，蔚然成林了。然彼詳則我略，此文僅從「銅器銘文釋讀」的向度切入，對後世尚流傳下來三人有交集的地方著手，稍稍分解出三人的區處來。

何澤恆在《歐陽修之經史學》已指出：「歐公集古錄之成書，得劉原父之助為多」、「原父博學通方，歐公素所深服，而於收藏古器物，二人可謂同好」，又說「歐公得於原父之銘文固不少。而原父又能讀古文銘識，進而考知其人之事蹟，尤為歐公所倚重，故跋尾採錄其說者甚多」，然「時亦有楊南仲者，多識古文奇字，然其釋銘文往往與原甫有異。歐公於此所涉不深，至未能斷其是非者，則並錄二家之說」，「此外尚有章友直者，亦識古文奇字」，「是知集古錄之作，可謂博採通人之說，而其中尤以劉原父之關係為至深也。」¹⁰而李興祥在〈由《集古錄》看歐陽脩之治學精神〉中也說：「歐陽修把收集金石文字作為自己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來看待並『費盡心思』。如此浩大的工程靠一個人的力量畢竟有限，他的行動也得到了不少朋友的支持，韓琦、王素、蘇軾、裴如晦等人就積極幫其搜索。其中以好友劉敞（劉原父）對《集古錄》的完成有著不可忽視的貢獻。劉敞不僅是宋代開疑經、改經之風的先驅，也是最早收集古器的人之一。他是歐陽修『異好』的同盟，是金石方面的專家，因此能夠給歐陽修不少的幫助。歐陽修多次稱：『故余家集錄《集古錄》自周武王以來皆有者，多得於原父』，『余所集錄既博，而為日滋久，求之亦勞，得於人者頗多。而最後成余志者，原父也。』歐陽修對從朋友處所得的金石器都詳加記述，特此標明並致信感謝。他的謙恭、不居功之心也正是會得到如此多的幫助的原因吧。」¹¹二人皆推崇「劉敞對《集古錄》的完成有著不可忽視的貢獻」，那麼，評定歐陽脩對金文「所涉不深」是個「含蓄」的修辭呢？還是實情的一種揭露呢？在文中表彰的《集古錄》克底於成的功臣除劉敞外，他如楊元明相較起來又是如何？可否就《集古錄》中三人對

¹⁰ 何澤恆：《歐陽修之經史學》，文史叢刊之五十四，頁183-184。

¹¹ 李興祥：〈由《集古錄》看歐陽脩之治學精神〉，《時代文學》2009年第4期，頁142。

銅器銘文的釋讀交會面去考察衡量呢？以劉敞、楊元明與歐陽脩的交情來看，無疑的，劉敞當排在前頭倒是不爭的事實，此從日人東英寿考校、洪本健箋注的《新見歐陽脩九十六篇書簡箋注》根據《四部叢刊》本《歐陽文忠公文集》存錄的書簡，再加上天理本¹²新見書簡作統計，總計十篇以上的受簡者有「梅堯臣（四十七）、韓琦（四十五）、呂公著（三十六）、劉敞（二十九）、薛仲孺（二十）、王素（十九）、蔡襄（十六）、焦千之（十六）、歐陽發（十五）、吳奎（十三）、王拱辰（十二）和常秩（十）」¹³，可見劉敞雖排在梅堯臣、韓琦、呂公著之後，位居第四，但楊元明卻連排都排不上，書跡杳然，無從追尋。但以《集古錄》中存有的銅器銘文釋讀來看，或許呈現出「主客易位」的有趣現象，這種透過情誼的交融流通，挾帶著理性又感性的酣暢興致，齊心並肩，胼手胝足地開闢金文學的新天地，而處在《先秦古器記》已然亡佚的今天，或許歐陽脩的《集古錄》正是求索的第一把鑰匙吧！

二 關於歐陽脩對銅器銘文「所涉不深」的問題

先來看看諸家評騭歐陽脩對銅器銘文「所涉不深」的問題吧！何澤恆氏的評語似乎蘊藉含蓄，有著修持的高度，反倒是歐陽脩的自陳相較之下「直白可愛」多了。試檢《新見歐陽脩九十六篇書簡箋注》第四二簡「與劉侍讀·見履常齋石刻」中，就清楚明確的自道：（春案：以下文中夾注，均以（）示之）

脩啟。近賈常行，曾致拙問。辱書，承經暑動履清勝，少慰瞻勤。兼蒙惠以〈韓城鼎銘〉¹⁴、〈蓮勺博山槃記〉，不意頓得此二佳物。脩所集錄前古遺蹟，自三代以來，往往有之，獨無前漢時字，常以為恨。今遽獲斯銘，遂大償素願，乃萬金之賜也。屬患腠（膝）瘡數日，家居絕客，無人為辨

¹² 今存《集古錄》有《四庫全書》本、金陵四留堂刊本，皆題作《集古錄》十卷；又有歐陽衡編校《歐陽文忠公集》本、《四部備要·歐陽文忠集》本、《四部叢刊·歐陽文忠公集》本、《三長物齋叢書》本、《行素草堂金石叢書》本、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本等，皆題作《集古錄跋尾》十卷，詳見王宏生：〈《集古錄》著錄、流傳與版本研究〉，《淮北煤炭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4期，頁35-36；至於「天理本」雖在中國沒有傳世，卻被保存在日本天理大學。這是因為南宋理宗開慶元年（1259）左右，鎌倉幕府在設置金澤文庫之時曾到中國購入了大批書籍，其中就包括了一百五十八卷本《歐陽文忠公集》（含附錄五卷），也就是現存的「天理本」。而在中國，由於戰亂等原因，這個本子失傳了，未能傳入明代內府。詳見〔日〕東英寿考校、洪本健箋注：《新見歐陽脩九十六篇書簡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6月），頁16-17。

¹³ 〔日〕東英寿考校、洪本健箋注：《新見歐陽脩九十六篇書簡箋注》，頁29-30。

¹⁴ 〈韓城鼎銘〉以「得於韓城」稱名；又以銘首作「唯王九月乙亥」復稱「乙亥鼎」，今則習以作器者稱為「晉姜鼎」。

古文，當徐訪博學者識之，續錄寄上。今且於郵中致此粗報，已獲佳貺爾。今歲大熱，疲病尤覺難支。西州高爽，更冀慎護，以副區區，不宣。脩再拜原甫安撫學士坐前。廿一日謹空。¹⁵

書簡中提到劉敞「惠以〈韓城鼎銘〉、〈蓮勺博山槃記〉」的前漢「二佳物」，可惜的是，「家居絕客，無人為辨古文，當徐訪博學者識之，續錄寄上」，但是現在自己「疲病尤覺難支」，也沒辦法去找人等等。在這段敘述中，隱隱約約地呈顯出三個問題：第一是歐陽脩可能無法親自辨識如〈韓城鼎銘〉、〈蓮勺博山槃記〉的「古文」；第二則是他必須求助於當時的「博學者」來「識之」；第三是劉敞似乎也沒有附上釋文給他，而是將此二物之「銘」惠贈而已，所以歐陽脩才得「續錄寄上」。在《箋注》注〔一〕中，解釋「劉侍讀」為「劉敞（一〇一九至一〇六八），字原父（父，一作『甫』），慶曆進士。敞小歐公十二歲，學識淵博，尤長於《春秋》學，為歐所敬重。皇祐時，即參與潁州聚星堂詩會，後在京師與歐交往更多。嘉祐五年（一〇六〇），拜翰林侍讀學士，知永興軍，歐有贈詩，京都、長安兩地書信不斷。敞又以長安所獲古器銘文相贈，令嗜好集古的歐公不勝欣喜。」大抵說明了此簡書寫的背景，但只是強調「敞又以長安所獲古器銘文相贈」罷了。另外《箋注》也比較了天理本與《叢刊》本《歐集·書簡》卷五嘉祐七年（1062）作的〈與劉侍讀〉第三簡字句的參差，相應句子作：

兼蒙惠以〈韓城鼎銘〉及漢〈博山槃記〉，二者實為奇物。某集錄前古遺文，往往得人之難得，自三代以來莫不皆有，然獨無前漢字，每以為恨。今遽獲斯銘，遂大償其素願。其為感幸，自宜如何！屬患膝瘡，家居絕客，無人為識古文，故第於郵中粗報已受二銘之賜。篆畫當徐訪博識尋繹，續得附致。¹⁶

¹⁵ 〔日〕東英寿考校、洪本健箋注：《新見歐陽脩九十六篇書簡箋注》，頁62-63。箋注〔一〕「題下『履常齋』疑即後山居士之齋名。陳師道，彭城（今江蘇徐州）人，字履常，號後山居士，為蘇門六君子之一，少學文於曾鞏。元祐初，由蘇軾等薦為徐州教授，又任太學博士。著有《後山集》。」《箋注》懷疑此簡是修改本，當亦嘉祐七年（一〇六二）所作。另《文忠集·書簡五·與劉侍讀原父（嘉祐七年）》則作：「某啟：賈常行，嘗附狀，辱書，承經暑動履康和，兼蒙惠以〈韓城鼎銘〉及漢〈博山槃記〉，二者實為奇物。某集錄前古遺文，往往得人之難得，自三代以來莫不皆有，然獨無前漢字，每以為恨。今遽獲斯銘，遂大償其素願，其為感幸，自宜如何？屬患膝瘡，家居絕客，無人為識古文，故第於郵中粗報已受二銘之賜，篆畫當徐訪博識尋繹，續得附致。其餘區區，萬不述一。大熱慎護，以副瞻勤，清水安能久滯耶？實負愧也。」〔北宋〕歐陽脩：《文忠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一百四十八，頁520。

¹⁶ 〔日〕東英寿考校、洪本健箋注：《新見歐陽脩九十六篇書簡箋注》，頁63。

比觀兩簡文字雖大同小異，但歐陽脩在獲贈「斯銘」大償素願之餘，禁不住興奮情態以致於「驚喜失聲」「其喜若斯」¹⁷震盪著，而與「無人為識古文」的遺憾交織摻和，並允諾「篆畫當徐訪博識尋繹，續得附致」，也只能緩緩尋覓解讀人來「尋繹」一番，從而推知歐陽脩可能真的對銅器上的「古文」無法「尋繹」，「不識」應不是個遜辭或謙辭，而「所涉不深」可能真是個婉辭了。

當然，單文孤證恐難為憑，或許還可從嘉祐七年（1062）夏五月二十八日所寫的〈范文度模本蘭亭序（附）〉略窺一斑，他說：「余嘗集錄前世遺文數千篇，因得悉覽諸賢筆跡。比不識書，遂稍通其學，然則人之於學，其可不勉哉！今老矣，目昏手顫，雖不能揮翰，而開卷臨几，便別精麤。若范君所書，在余集錄實為難得也。竊幸覽之，為之忘倦。」又說：「書雖列於六藝，非如百工之藝也。蔡君謨以書名當世，其稱范君者如此，不為誤矣。」並感慨說：「自唐末干戈之亂，儒學文章掃地而盡。宋興百年之間，雄文碩儒比肩而出，獨字學久而不振，未能比蹤唐之人，余每以為恨。今乃獲見范君筆法，信乎時不乏人，而患知之不博。不然，有於中必形於外，若范君者，筆跡不傳於世，而獨傳其家，蓋潛光晦德，非止其書閤不傳也。」¹⁸雖然歐陽脩文中的「比不識書」的「書」應是指「諸賢筆跡」，如何「便別精麤」是透過不斷學習觀摩而得來的眼力和經驗才知其「可愛」與否的。文中說的「書雖列於六藝，非如百工之藝也」，指的應是「禮、樂、射、御、書、數」中的「書」，跟漢代學者如班固、鄭眾、許慎所指涉的「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文字學上的六書分屬不同的範疇，「蔡君謨以書名當世」的「書」，是跟《集古錄跋尾九·唐辨石鍾山記》所說的：「至於書畫，亦皆可喜。蓋自唐以前，賢傑之士，莫不工於字書，其殘篇斷稟為世所寶，傳於今者，何可勝數？彼其事業，超然高爽，不當留精於此小藝。豈其習俗承流，家為常事，抑學者猶有師法，而後世偷薄，漸趣苟簡，久而遂至於廢絕歟？今士大夫務以遠自高，忽書為不足學，往往僅能執筆，而間有以書自名者，世亦不甚知

¹⁷ 歐陽脩〈書簡五·與劉侍讀原父（嘉祐七年）〉云：「某啟：昨賢弟行，嘗奉狀。屬合宮大禮，前後事叢，遂闕致問。昨日進奏院送九月十五日所寄書，竊承動履清勝，兼復惠以古器銘文，發書，驚喜失聲，群兒曹走問迺翁夜獲何物，其喜若斯？信吾二人好惡之異如此，安得不為世俗所憎邪？其窮達有命爾，求合世人以取悅則難矣。自公之西，《集古》屢獲異文，并來書集入錄中，以為子孫之藏也。幸甚幸甚。歲律漸寒，惟為時自重。」見〔北宋〕歐陽脩：《文忠集》，卷一百四十八，頁520。

¹⁸ 以上所引見〔北宋〕歐陽脩：《集古錄跋尾四》，《文忠集》，卷一百三十七，頁393-394。另本作「范文度模本蘭亭序與前跋相類，疑是稟本，今兩存之」；「自唐末兵戈之亂，儒學文章掃地而盡。宋興百餘年間，雄文碩儒之士相繼不絕，文章之盛遂追三代之隆，獨字學之法寂寞不振，未能比蹤唐室，余每以為恨。今迺獲見范君之書，信乎時不乏人，而患聞見之不博也。不然，范君之筆法，宜傳於世，久閤於家，蓋其潛光晦德，非獨其書之閤也。右集本。」可參。以下所引《文忠集》皆據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文忠集》，引文後僅註明書名卷次及頁碼。

為貴也。至於荒林敗塚，時得埋沒之餘，皆前世碌碌無名子，然其筆畫有法，往往今人不及，茲甚可歎也。」（《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二，頁449）文中的「字書」或單稱「書」，指的都是書法。至於文中強調宋代「字學久而不振，未能比蹤唐之人」，也是他長久以來「每以為恨」的隱痛，箇中的「字學」實際上是針對「書學」來說的成分居多，可見歐陽脩在用詞上「書」、「字」是不太區分的，也不措意那個精準度，唯不可諱言的，宋代「雄文碩儒」之士對文字甚或古文字的領域是較少花心力關注的。


《集古錄》既是歐陽脩「性顓而嗜古」的產物，真可謂包羅萬象，時空綿廣，舉凡「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並且超越時空人神物質所有的限制，「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但是風蝕雨侵，保存不當，加上「轉寫失真」¹⁹，增加文字辨識上的困難。何況「千卷之藏」的卷帙浩繁，內容豐富，「蓋自文、武以來，迄于五代，盛衰得失、賢臣義士、姦雄賊亂之事可以動人耳目者，至於釋氏道家之言，莫不皆有」，要將這「千卷之書者，刻之金石，託之山崖，未常不為無窮之計」²⁰，而陪伴歐陽脩這位「六一居士」的重要「養老」之物可是《集古錄》呢！²¹這裡頭就潛藏著他對文字的應用與看法吧！

通觀歐陽脩的《文忠集》，其實很少用到艱澀生僻的字，行文大抵淺顯易懂，明白曉暢居多，而像治平元年六月十日所書的《集古錄跋尾二·後漢析里橋郾閣頌》中，提到這些難字如「遭遇隕納」，或是「醴散關之嶠潔，徙朝陽之平瘝（春案：原文誤作「慘」）」等，他只能說「刻畫適完，非其訛謬而莫詳其義」，已充滿著懷疑無奈，但卻困於無法解決，只能「疑當時人語與今異，又疑漢人用字簡略，假借不同爾」，且擱置這個懸念「以俟博識君子」了（《文忠集》卷一百三十五，頁367）；又如《集古錄跋尾一》中談〈石鼓文〉言：「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

¹⁹ 以上參見〔北宋〕歐陽脩撰，李之亮箋注：《集古錄跋尾·集古錄目序》，《歐陽脩集編年箋注》（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12月），卷一百三十四，頁297-298。春按：此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文忠集》並無收錄。

²⁰ 〔北宋〕歐陽棐：〈集古錄日記〉，〔北宋〕歐陽脩：《集古錄》（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景印國家圖書館藏文津閣四庫全書），頁1-2。

²¹ 〔北宋〕歐陽脩撰，李之亮箋注：《集古錄跋尾·集古錄目序》，《歐陽脩集編年箋注》，卷一百三十四，頁484。治平丙丁秋饗攝事，齋于東閣書。跋後一有此七十五字，「或問余曰：『何謂六一居士？』余曰：『吾家有書一萬卷、《集古錄》一千卷、棊一局、琴一張、常置酒一壺。』問者曰：『此五一也，奈何？』余曰：『以吾一翁，老於五物之間，豈非六一乎？』」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文忠集》未收「或問余曰」以下這段，見李之亮箋注〔四〕：「此段原在卷後附，今移至此。」

五，不可識者過半。余所集錄，文之古者，莫先於此。」（《文忠集》卷一百三十四，頁355）或是談〈周穆王刻石〉說：「據《周穆王傳》，但云登山，不言刻石，然字畫亦奇怪。土人謂壇山為馬蹬山，以其字形類也。」（《文忠集》卷一百三十四，頁352），都僅是客觀呈現，不作任何的分解，並誠實地說〈石鼓文〉他「不可識者過半」呢！若從《集古錄》中較易掌握的有關古文字的解讀與認識來看，其實歐陽脩很早就留意收集「古金石之文」，一如《集古錄跋尾六·唐韓覃幽林思》中即言：「余為西京留守推官時，因遊嵩山得此詩，愛其辭翰皆不俗。後十餘年，始集古金石之文，發篋得之，不勝其喜。」（《文忠集》卷一百三十九，頁415）並極力求全責備，即〈宋文帝神道碑〉所說：「余家《集古》所錄三代以來鍾鼎彝盤銘刻備有，至後漢以後始有碑文，欲求前漢時碑碣，卒不可得，是則冢墓碑自後漢以來始有也。」（《文忠集》卷一百三十七，頁395）而摩娑閱覽，興酣神愉之情，溢於紙上，舉如〈唐李石神道碑〉所述：「右，李石碑，柳公權書。余家集錄顏、柳書尤多，惟碑石不完者，則其字尤佳，非字之然也。譬夫金玉，埋沒於泥滓，時時發見其一二，則粲然在目，特為可喜爾。」（《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二，頁451）或如〈後周大像碑〉所言：「翫物以忘憂者。惟怪奇變態，真偽相雜，使覽者自擇，則可以忘倦焉。故余於《集古》所錄者博矣。」（《文忠集》卷一百三十七，頁401）從中可窺見歐陽脩面對金石碑文時的「可喜」、「忘憂」、「忘倦」之神情，歷歷如繪，而他在收藏賞玩之餘，也能將之用為研究的素材，進一步去掌握古文字的諸種樣態，嘗饌知其鼎味矣！

當然，他讀過古文字梯階的《說文解字》，此從〈後漢熊君碑〉所云：「治《歐羊尚書》，其字非訛闕，而以『陽』為『羊』，蓋古文字少，故須假借。至漢字已備而猶假用，何哉？後云『太歲在申』，『申』上減一字，以歷推之，當是丙申。又云『碑師舂陵福造』，『福』上減一字，當是其姓。其書『顯』字皆為『顙』，按許慎《說文》，顯從𣎵聲，而轉為累，其失遠矣，莫曉其義也。」（《文忠集》卷一百三十六，頁385）可見他是能利用曆法來推算，用碑文體例來補闕，談「古文字少，故須假借」，尤其我們注意到，他應用《說文解字》來判斷文字的正訛演變，從而推知他會翻檢《說文解字》來印證文字的流變。但他也承認，即連隸書自己也不太認識，如在〈後漢稟長蔡君頌碑〉中說：「故天章閣待制楊旼嘗為余言：漢時隸書在者，此為最佳。旼自言平生惟學此字。余不甚識隸書，因旼言遽遣人之常山求得之，遂入於錄。」（《文忠集》卷一百三十六，頁384）由此窺知，為學雖有精疏主次之別，歐陽脩卻能坦率誠懇地面對自己的局限與不足，是連「隸書」他都「不甚識」，更何況是古文字呢！

但因《集古錄》的搜集賞玩親炙熱愛，讓他對古文字有更多、更廣的接觸和更深的理解，如在〈唐石壁寺鐵彌勒像頌〉中說：「余所集錄古文，自周、秦以下訖於顯德，凡為千卷，唐居其十七八。其名臣顯達下至山林幽隱之士所書，莫不皆有，而婦人之書，惟此高氏一人爾。」（《文忠集》卷一百三十九，頁421）又云：「右〈興唐寺石經藏贊〉，皆其作者自書，而八分者數家，惟蔡有鄰著其姓氏。有鄰名重當時，杜甫嘗稱之於詩。其為苑咸所書小字，與三代器銘何異，可謂實名相稱也。余家集錄有鄰書頗多，皆不若此贊，故尤寶之。余初不識書，因集古著錄，所閱既多，遂稍識之，然則人其可不勉強於學也！治平元年三月三十日書。」（《文忠集》卷一百三十九，頁422）又在〈唐開元金籙齋頌〉中云：「雖不著書人姓氏，而字為古文，實為包書也。唐世華山碑刻為古文者，皆包所書。包以古文見稱，當時甚盛，蓋古文世俗罕通，徒見其字畫多奇，而不知其筆法非工也。余以《集錄》所見三代以來古字尤多，遂識之爾。」（《文忠集》卷一百四十，頁424）由此可見，《集古錄》對他認識古文字來說，助益匪淺，真所謂「余以《集錄》所見三代以來古字尤多，遂識之爾」，或是在〈唐玄靜先生碑〉說的：「（張）從申每所書碑，李陽冰多為之篆額，時人必稱為二絕，其為世所重如此。余以集錄古文，閱書既多，故雖不能書，而稍識字法。」（《文忠集》卷一百四十，頁435）在在強調他因「集錄古文」，接觸一多，識閱既廣，眼力漸準，透過經驗的不斷累積而能「稍識字法」了。

歐陽脩開始收集「古金石之文」起於何時呢？在〈唐韓覃幽林思〉中曾提到：「余為西京留守推官時，因遊嵩山得此詩，愛其辭翰皆不俗。後十餘年，始集古金石之文，發篋得之，不勝其喜。余在洛陽，凡再登嵩嶽。其始往也，與（集本作以）梅聖俞、楊子聰俱。其再往也，與謝希深、尹師魯、王幾道、楊子聰俱。當發篋見此詩以入集時，謝希深、楊子聰已死。其後師魯、幾道、聖俞相繼皆死。蓋遊嵩在天聖十年，是歲改元明道，余時年二十六，距今嘉祐八年，蓋三十一年矣。遊嵩六人，獨余在爾，感物追往，不勝（二字集本作可為）愴然。六月旬休日書。」（《文忠集》卷一百三十九，頁415）若根據文中「遊嵩在天聖十年，是歲改元明道，余時年二十六」推算起，在「後十餘年，始集古金石之文」，可知大抵是慶曆、皇祐年間就開始留意此事，文中提到梅堯臣、謝絳、尹洙、王復諸位好友；另在〈唐蔡有鄰盧舍那珉像碑〉中言：「余所集錄自非眾君子共成之，不能若此之多也。」（《文忠集》卷一百三十九，頁422），但卻沒有提到對他收集「古金文」最重要的鈐鍵人物「劉敞」，大抵那是更後之事矣！

那麼，歐陽脩真正對古文字的解說認識又是如何呢？這或許可從下列諸條稍

稍推其端倪：（一）是涉及文字假借的問題者，如談三代古器銘「眉」、「麋」的假借現象，〈後漢北海相景君銘〉說：「碑銘有云：『不永麋壽。』余家集錄三代古器銘，有云『眉壽』者，皆為『麋』，蓋古字簡少通用，至漢猶然也。」（《文忠集》卷一百三十五，頁374），或是〈後漢冀州從事張表碑〉所云：「『畔桓』疑是『盤桓』（集本有漢時二字），文字簡少假借爾。」（《文忠集》卷一百三十六，頁379）皆屬此類；（二）是談各代書寫用字的差異，如〈後漢司隸楊君碑〉所說的「惟以𠂔為坤，以余為斜，漢人皆爾，獨『詆』字未詳。」（《文忠集》卷一百三十六，頁376）以及〈後漢郭先生碑〉所云：「其以『而』為『如』，及用『鄉邨』字，與〈婁壽碑〉同，蓋漢人如此爾。」又說：「其用『鄉邨』字與漢〈婁壽碑〉同，其曰『寬舒如好施』，蓋以『如』字為『而』也。……《春秋》書『星隕如雨』，釋者曰『如，而也』，然施於文章，以『如』為『而』始見於此也。」（《文忠集》卷一百三十六，頁381-382）又如〈魏鄧艾碑〉所指出的：「艾於三國時為名將，嘗有大功，其姓名聞於世甚顯，史與充人皆不應誤。而『艾』、『乂』二名不同如此，此君子所以慎於傳疑也。余謂古人『艾』、『乂』常通用，《漢書》曰『黎民艾安』，與『懲艾』、『創艾』，注皆讀為『乂』，豈非鄧侯名『艾』音『乂』，而書碑者從之歟？後人讀史無音注，乃且以為蒿艾之艾，而流俗轉失，久而訛繆，遂不復正。此理或然，覽者詳之。」（《文忠集》卷一百三十七，頁391）即是；但是，真真涉及古文字的，實如鳳毛麟角，屈指可數，且言簡意賅，未加詳述，舉如〈後漢費府君碑〉說「『穆』字為『𠂔』，古文多然。」（《文忠集》卷一百三十六，頁383）僅僅指出「穆」字古文字形的大多寫法罷了。尤其是真正碰到難解之字，即連隸書他也一籌莫展，徒呼負負，比如他在寶元元年（1038）任職乾德縣令時，寫了一封〈與王源叔問古碑字書〉說：「修以罪廢，不從先生長者之遊久矣。今春蒙恩得徙茲邑，然地僻而陋，罕有學者，幸而有之，亦不足與講論。或事有凝滯無所考正，則思見君子，北首瞻望而已。縣有古碑一片（一作砢），在近郊數大冢之間，《圖經》以為玄儒翟先生碑。其文云：『先生諱壽，字元考，南陽隆人也。』大畧述其有道不仕，以數學為業。然不著其姓氏，其題額乃云『玄儒𠂔（一作玄儒𠂔）先生碑』。𠂔字疑非翟字，而莫有識者，許慎《說文》亦不載，外方無他書可考正。其文辭簡質，皆隸書。書亦古樸，隱隱猶可讀，乃云『熹平三年』所立，去今蓋八百五十六年矣。漢之金石之文存於今者蓋寡，惜其將遂磨滅，而《圖記》所載，訛繆若斯，遂使漢道草莽之賢湮沒而不見。源叔

好古博學，知名今世，必識此字，或能究見其人本末事跡，悉以條示，幸甚幸甚！」²²由此可見，即連「隱隱猶可讀」的「隸書」，他雖極力勘正，但不管是字形或體例他都得求助於時居京師的王洙。而關於這些疑難字，《歐陽脩集編年箋注》隸定作「官孺𡔁（一作官孺𡔁）」，《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則隸定作「古孺𡔁（一作𡔁孺𡔁）」，以字形結構與體例觀之，「亨」「烹」古文有作「𡔁」形者，此即《集韻》：「烹，古作𡔁。」《集韻》：「亨，古作𡔁。」二字皆源於《說文》篆文的「𡔁」作「亭」者，而「𡔁，與亭同」。²³「𡔁」字經「隸變」後，分化出「亨」「烹」「享」三字²⁴，並與「郭」字所從「𡔁」「𡔁」混同，頗疑此古碑題額作「官」「古」者，或以釋「郭」字為宜。據《玉篇·臺部·臺字》云：「古穫切。《說文》云：度也，民所度居也。《白虎通》云：郭之為言廓也，大也。今作郭。」²⁵或「享」字，《隸辨》說：「臺讀若郭，《說文》作𡔁，從回，兩亭相對，或但從口作𡔁，隸變如上，譌𡔁為子。𡔁字從之，𡔁或作郭……郭譌從享。」²⁶以及《字彙·高部》：「《六書正譌》：此城臺字，象環城之形。俗用郭，从邑，乃國名。」²⁷以故《隸書大字典》第六邑部「郭」字下云：「曹全碑『興造城郭』……諸碑皆以郭為『臺』，經典相承用之。」²⁸可見臺、郭二字相通，字又作「𡔁」。而「玄」字，隸書作𡔁（白石神君碑）、𡔁（熹平石經《儀禮·特牲》）²⁹，雖與此古碑之上半字形作「𡔁」差近，但卻與作「官」「古」者不近，若以碑文體例言之，以當作姓氏為宜，則釋「郭」比釋作「玄」合理些，至於下半字形保存不全，或乃風侵雨蝕磨滅殘泐所致。一如「儒」本作𡔁（白石神君碑陰）、𡔁（曹全碑）³⁰，

²² [北宋]歐陽脩：《居士外集》，《文忠集》，卷六十八，頁543。「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隸作「古孺𡔁」，《歐陽脩集編年箋注》隸作「官孺𡔁」，參[北宋]歐陽脩：《居士外集》，《文忠集》（臺北：世界書局，1985年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十八，頁6。[北宋]歐陽脩撰，李之亮箋注：《居士外集》，《歐陽脩集編年箋注》，卷十八，頁302-303。

²³ 林尹、高明主編：《中文大辭典（第一次修訂版普及本）》（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90年9月），第一冊，頁735。

²⁴ [東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標點本）》（臺北：藝文印書館，2005年10月），頁231-232。《說文解字》：「𡔁，度也，民所度居也。」段注云：「按城臺字今作郭，郭行而臺廢矣，又於「𡔁」下注云：「薦神作亨，一作享；飪物作亨，亦作烹」，「小篆作𡔁，故隸書作亨、作享，小篆之變也。」

²⁵ [南朝梁]顧野王：《宋本玉篇》（北京：中國書店，1983年9月），卷一，頁37。



²⁶ [清]顧藹吉：《隸辨》，李學勤主編：《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三十九冊，卷六，頁33（總頁628）。

²⁷ [明]梅膺祚：《字彙》（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1年6月），亥集·高部，頁557。

²⁸ 隸書大字典編纂組：《隸書大字典》（臺北：宏業書局，1975年8月），頁28。

²⁹ 徐無聞主編：《甲金篆隸大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1年7月），頁253。

³⁰ 徐無聞主編：《甲金篆隸大字典》，頁540。

而碑作「孺」；「學」本作〈曹全碑〉、〈孔龢碑〉³¹，而碑作「𦣻」「𦣼」般，已失本真，無法分辨矣！

當然，或許是文人才性所致，《文忠集》中反而多的是對文字書體演變的感喟情腸，如他在〈唐美原夫子廟碑〉說：「（王）崑，天寶時人，字畫奇怪，初無筆法，而老逸不羈，時有可愛，故不忍棄之，蓋書流之狂士也。文字之學傳自三代以來，其體隨時變易，轉相祖習，遂以名家，亦惡有定耶？至魏晉以後，漸分真、草，而羲、獻父子為一時所尚，後世言書者，非此二人（集本有則字）皆不為法。其藝誠為精絕，然謂必為法，則初何所據？所謂（集本有此二字）天下孰知夫正法哉？崑書固自放於怪逸矣，聊存之以備博覽。治平元年八月十一日書。」

（《文忠集》卷一百三十九，頁422-423）所謂「文字之學傳自三代以來，其體隨時變易」，字體本身隨時變化的內在肌理，加上時空的侵蝕銷磨毀壞，在在觸動他的心懷，促使他極盡所能地去蒐集典藏著錄研究，此即嘉祐八年（1063）寫〈唐孔子廟堂碑〉說的：「余為童兒時，嘗得此碑以學書，當時刻畫完好。後二十餘年復得斯本，則殘缺如此（二字集本作矣）。因感夫物之終弊，雖金石之堅不能以自久，於是始欲集錄前世之遺文而藏之。殆（集本作逮）今蓋十有八年，而得千卷，可謂富哉！」（《文忠集》卷一百三十八，頁405），或是治平元年（1064）寫〈唐吳廣碑〉時也說：「碑字稍磨滅，世亦罕見，獨余集錄得之，遂以傳者，以其筆畫之工也。故余嘗為蔡君謨言，書雖學者之餘事，而有助於金石之傳者，以此也。」（《文忠集》卷一百三十八，頁410-411）而這種嗜好收藏，他一再表示「非徒玩好而已」，它是有實際功用的，正「史」之「訛舛」即其中重要的一環，在〈唐孔穎達碑〉中已標出：「傳云字仲達，碑云字冲遠。碑字多殘缺，惟其名字特完，可以正傳之謬不疑。以冲遠為仲達，以此知文字轉易失其真者，何可勝數？幸而因余集錄所得，以正其訛舛者，亦不為少也。乃知余家所藏，非徒玩好而已，其益豈不博哉！」（《文忠集》卷一百三十八，頁409）當然，文集中念茲在茲，不斷表述，觸處皆是，但核實來說，不可諱言的，「古金文」的釋讀有可能真的不是歐陽脩的專長！

三 劉敞出守永興與歐陽脩《集古錄》的關係

歐陽脩曾在嘉祐五年（1060）為劉敞的出守永興，寫了一首古詩〈奉送原甫

³¹ 徐無聞主編：《甲金篆隸大字典》，頁213。

侍讀出守永興」³²，並致贈他「荊州魚枕之蕉」和「宣城鼠須之管」，希冀他「新詩醉墨時一揮，別後寄我無辭遠」，用來補足「意氣論交相得晚」的遺憾。而劉敞這次的出守永興，對歐陽脩或宋代及之後的整個金文學學術發展研究來說，立下了里程碑，拓開了新境界，洵可謂石破天驚，綻放出最豐腴亮美的果實。

根據歐陽脩〈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的記載，劉敞的出守永興軍，其實是相當失志且孤獨的。嘉祐四年（1059），他因反對在「孟冬祫」祭時「加上天子尊號」，與群臣相忤，再加上「公既驟屈廷臣之議，議者已多仄目；既而又論呂溱過輕而責重，與臺諫異，由是言事者亟攻之。公知不容于時矣，會永興闕守，因自請行，即拜翰林侍讀學士，充永興軍路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府事。」³³可見他是在「不容于時」，獨排眾議的孤悶天地中，只好抑鬱地自我放逐、自我了斷「自請行」來到永興的，雖然劉敞自己在《公是弟子記》中強調「智不求隱，辯不求給，名不求難，行不求異」的「不求異」，而如同《四庫全書提要》所評的：「蓋是時三黨交訐，而敞獨蕭然于門戶之外，故其言和平如是。徒以獨抱遺經，澹于聲譽，未與伊、洛諸人傾意周旋，故講學者罕相稱述，實則元豐、熙寧之間，卓然一醇儒也。」³⁴雖然如此，劉敞依然免不了有憤懣失志避地他方的逃遁之舉，亦即其弟劉攽所述：「公異操，故與世多不合」，「介然獨立，上下交忤，謗言益多」，「執政不欲公在內，每有關，輒置不用。會永興軍闕守，公自請治之。執政喜公之去，疏奏即除翰林侍讀學士，知永興軍府事。」³⁵但世事變化，也因此種不平離京而去的機遇，讓他「雖失之東隅，可以收之桑榆」，劉攽言劉敞「在長安時，得三代時鍾鼎器皿數十，皆有篆刻銘識，文字奇古，公按讀之，因以考知前代制度，用匹敦簠簋與前世學者所說不同；其所言『齊黃同冕』，亦書傳所不載也。公珍惜之，嘗曰：『我死，子孫以此烝嘗我。』」³⁶可見對「三代鍾鼎器皿」奇古的篆刻銘識的收藏和研究，恰好寄寓了他「與時乖迕，捩曲為直，不能自白」的愁悶以及「胸中感慨，無處告愬」³⁷的苦衷呢！

劉敞赴永興軍後，好友歐陽脩也屢屢在書信中流露出悵惘若失，「事無恰好」的寂寞之情，此可從兩人書信的往返窺見一斑，如寫於嘉祐五年（1060）的〈書

³² 〔北宋〕歐陽脩：《居士集》，《文忠集》，卷八，頁77，詩題一作〈奉送永興安撫劉侍讀〉。

³³ 〔北宋〕歐陽脩：《文忠集》，卷三十五，頁281。

³⁴ 〔北宋〕劉敞：《公是先生弟子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叢書集成初編，頁41-42。

³⁵ 〔北宋〕劉敞：〈故朝散大夫給事中集賢院學士權判南京留司御史臺劉公行狀〉，《彭城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景印國家圖書館藏文津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三百六十六冊，卷三十五，頁417。

³⁶ 〔北宋〕劉敞：〈故朝散大夫給事中集賢院學士權判南京留司御史臺劉公行狀〉，《彭城集》，集部·別集類，第三百六十六冊，卷三十五，頁417。

³⁷ 以上所引見〔北宋〕劉敞：〈與青州歐陽尚書別紙〉，《彭城集》，集部·別集類，第三百六十六冊，卷二十七，頁390。

簡五·與劉侍讀（原父）》云：「適歸自外，捧惠佳篇，豈勝欣感。偶然之會雖草率，而縛於文字，遂為他時故事，茲敢不勉也。然西齋素患寂寞，近方稍葺，而原父去此稍遠，此俗所謂事無恰好也。」（《文忠集》卷一百四十八，頁517）已初感受到知音「稍遠」乏人共賞談心的情味；況更道出：「自原甫既西，雖不為官制所拘，朋遊亦自寂寞。況遂當憂責，履畏塗，其為情況可知。偶思春物將動，故都多佳致，為樂豈復可涯？汨沒聲利，惟溺惑者不勝其勞而但見其樂。粗有識知，兼以衰病，此事難為他人道，獨不知原甫諒之否？因風幸數垂問，以慰瞻企。」（《文忠集》卷一百四十八，頁517）可知雖在「春物將動」的佳致時節，他卻樂減意珊，加上肉體「衰病」的折磨，卻耿耿於懷在「獨不知原甫諒之否」？這「難為他人道」的心秘隱情，只祈求「原甫諒之」，並期盼「因風幸數垂問」用以慰飫他的殷殷「瞻企」之情；唯隨著時日的推移，歐陽脩的情緒也堆疊得越來越濃烈，筆墨也愈下愈重，如在嘉祐六年（1061）寫〈書簡五·與劉侍讀（原父）〉時說：「惟思春物爛然，故都遺勝不可勝覽，而公專有之，猶恐厭飫所見，不以難得為惜也，須知有不可得之者也。賢弟亦稀相見，蓋難得盡從容之適爾。公自至鎮，一嘗辱問，遂絕惠音，不知何嫌，遽爾見疏也？西齋塵土，無復人跡。偶因連日假，故試尋筆研，略布此誠，以此亦可見其為貺（真蹟用此貺字）也。其他俗事可憎，不復多道，但布瞻企之勤爾。氣候猶未和暢，不知西路如何？惟為國自愛。某祇拜。」、「初望西物甚眾，今寸紙一字不可得，況南山竹萌之類耶？至於新詩醉墨，並棄前約，無乃太甚乎！」³⁸箇中對劉敞「遽爾見疏」的不解，與「寸紙一字不可得」的憤恨，累積到「並棄前約，無乃太甚乎」的情緒賁張吶喊，似可從旁猜測，兩人可能有些罅隙心結難以排除，而劉敞當時可能處在負氣倒懸與友朋不通音訊，關起門來自我療傷後解開心鎖的情境。

到了嘉祐七年（1062）卻又復好如初，對劉敞的贈銘，歐陽脩表達出欣喜若狂，難掩雀躍的心態，即卷一百四十八〈書簡五·與劉侍讀（原父 嘉祐七年）〉所載：「某啟：昨賢弟行，嘗奉狀。屬合宮大禮，前後事叢，遂闕致問。昨日進奏院送九月十五日所寄書，竊承動履清勝，兼復惠以古器銘文，發書，驚喜失聲，群兒曹走問迺翁夜獲何物，其喜若斯？信吾二人好惡之異如此，安得不為世俗所憎邪？其窮達有命爾，求合世人以取悅則難矣。自公之西，集古屢獲異文，并來書集入錄中，以為子孫之藏也。幸甚幸甚。歲律漸寒，惟為時自重。」（頁520）

³⁸ 〔北宋〕歐陽脩：《文忠集》，卷一百四十八，頁517。〈書簡五·與劉侍讀（原父 嘉祐六年 與前帖相類，疑是槧本，今兩存之）〉則作：「某啟：自春以來，苦兒女輩疾病，憂煎百端，遂闕馳問，亦怪久不承惠音，不審何嫌，遽見斥外？」

書信中表明當劉敞「惠以古器銘文」時，雖是「夜」間，但歐陽脩發出的驚嘆聲，卻招引「群兒曹」的注意，當時歐陽脩已然看出這些「異文」的傳世價值，所謂「自公之西，集古屢獲異文，并來書集入錄中，以為子孫之藏也。幸甚幸甚」，並為自己能夠與其間，感到莫大的幸運。雖然後來劉敞「居永興歲餘，遂以疾聞。八年八月召還，判三班院、太常寺」³⁹，又回到了京師。而這一段書信的往返，無異透露出那猶如波濤起伏的情緒流線圖在移動跳躍著，一段不與世苟合、不合時宜的落寞憤慨閉鎖的天地，因著古都地下的埋藏，卻造就出《先秦古器記》與《集古錄》這金文學的端緒來！

《東都事略》曾載及劉敞因地利之便，極力搜集青銅器的情形說：「劉敞，字邊父，袁州臨江人也……除翰林侍讀學士，知永興軍。召還翰林。治平中，判太常寺。敞在永興得眩瞽疾，求便郡，英宗曰：『如劉敞者，豈易得哉？』遂出知汝州，改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卒，年五十。敞為人明白俊偉，博學自信，自六經諸子百氏至傳記小說，無所不通。為文敏贍，在西掖時，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敞將下直，為之立馬卻坐，一揮九制，文詞典雅，各得其體。在長安，得先秦古器數十，愛其款識文字奇古，因以考知三代制度與先儒所說不同者。所著《春秋權衡說例》、《意林》總四十卷，文集六十卷，《弟子記》五卷，《七經小傳》五卷。」⁴⁰另外，劉敞的弟弟劉攽在〈送原甫帥永興〉中也歌詠著：「讀書當為王者師，論兵要作萬人將。古來志士希兩遂，白首儒生彼無望。騏驎一出凡馬空，豫章蟠根歲逾壯。金華事業爛然新，徂西謀謨誰與讓。」⁴¹只不過吸引著劉敞待下來的可能是「愛其款識文字奇古，因以考知三代制度與先儒所說不同者」，致使「西人歡歌公肯留」，而在他「自請行」的情況下，秦山渭水之間的古器物銘，正可稍稍慰藉轉移他傲岸孤卓、獨排眾議、敢言犯上的不如意，並消解那憤懣悲苦的心懷！何況他早就對古文物著迷，此也可從劉敞所寫的〈同原甫詠秘閣詔藏古器圖〉詩：「昔占金寶氣，天瑞告成功。繪事今時絕，書文自古同。剖鉤記巫錦，按刻異桓公。塵世無由覩，崑山策府中。」⁴²推知一二。雖然，在永興時劉敞得著「眩瞽疾」，但長安自古京城重地，「尚少力方豪」的劉敞，對先秦古器上的文字有他學識上的敏感度，能利用它來「考知三代制度」，並將所得遠寄那「意獨不怡」的歐陽脩，在友朋之間的疑義相析、切磋同賞之樂下（〈奉

³⁹ 〔北宋〕歐陽脩：《居士集三十五·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文忠集》，卷三十五，頁280-283。

⁴⁰ 〔南宋〕王稱：《東都事略》（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七十六，頁1-4。

⁴¹ 〔北宋〕劉攽：《彭城集》，集部·別集類，第三百六十六冊，卷七，頁320。

⁴² 〔北宋〕劉攽：〈同原甫詠秘閣詔藏古器圖〉，《彭城集》，集部·別集類，第三百六十六冊，卷十一，頁332。

答原甫九月八日見過會飲之作》），即便歐陽脩也面臨老病相侵的處境，詩文中一再流露的「老驥但伏櫪，壯心良可悲」（〈奉答原甫九月八日見過會飲之作〉，《文忠集》卷九，頁79）、「狂來有意與春爭，老去心情漸不能。世味惟存詩淡泊，生涯半為病侵陵」到「而今癡鈍若寒蠅」（〈病告中懷子華原父〉，《文忠集》卷十三，頁109）、「蕭條兩鬢霜後草」，「此物猶能慰衰老（一作病）」（〈答和閣老劉舍人雨中見寄〉，《文忠集》卷十三，頁109）以及「誰憐蕭颯鬢毛衰」、「老年其實厭追隨」（〈寄閣老劉舍人〉，《文忠集》卷十三，頁109）、「老來何與青春事，閒處方知白日長。自恨乞身今未得，齒牙浮動鬢蒼浪」（〈齋宮尚有殘雪思作學士時攝事于此嘗有聞鸞詩寄原父因而有感四首〉，《文忠集》卷十三，頁113）、「髀肉已消嗟病骨，凍醪猶可慰愁顏」（〈表海亭〉，《文忠集》卷十四，頁120），以及「脩以淋渴為苦，虛乏未任朝參」（〈與樞密侍郎簡〉）、「自春首已來，得淋渴疾，癰瘡昏耗，僅不自支。」（〈與王龍圖〉）⁴³等等，見出他對自己衰老病體的感憐覺知，簡直到令人怵目驚心的地步。

可是，一如《集古錄跋尾十·雜法帖其六》所述：「老年病目，不能讀書，又艱於執筆。惟此與《集古錄》可以把玩，而不欲屢閱者，留為歸穎銷日之樂也。蓋物維不足，然後其樂無窮，使其力至於勞，則有時而厭爾。然內樂猶有待於外物，則退之所謂『著山林與著城郭何異』，宜為有道者所笑也。」（《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三，頁460）《集古錄》正是慰解他晚年不堪的病體的寄情把玩之物，而劉敞的先他而逝，對他來說可是相當大的打擊，足足讓他「銜恨無窮」，在「維熙寧元年歲次戊申，四月壬寅朔十五日丙辰」所寫的《居士集·祭劉給事文》中，將劉敞比做千錘百鍊的「金」，吟道：「嗚呼！金百鍊以為鑒，而萬物不能遁其形。及為物蝕而蔽其光，頑然無異乎瓦礫。然而一遇良工之藥，磨而瑩之，則可以見肝膽而數毛髮。蓋其可昏者光，不可昏者性。其或廢而或用，由有幸與不幸。若吾原甫者，敏學通於今古，精識達於幽微，乃百鍊之英，而萬事之鑑也。一為末疾昏之，至使良醫不能措其術，百藥無所施其功，遂埋至寶，銜恨無窮！此所以

⁴³ 〔日〕東英寿考校、洪本健箋注：《新見歐陽脩九十六篇書簡箋注》，頁93-94箋注〔二〕云：「淋渴：歐多處文字又稱『渴淋』。《叢刊》本《書簡》卷九治平三年作《與薛少卿》云：『自春來，病渴淋不止，在告多日。』卷一〇治平四年（一〇六七）作《與大寺丞》云：『到穎渴淋復作。』《表奏書啟四六集》卷五作於熙寧二三年間的《乞壽州第二劄子》云：『伏念臣舊患眼目，已十餘年。又苦渴淋，亦五六歲。』又，《書簡》卷三熙寧三年作《與執政》亦云：『渴淋復作，遂不能支，自三月下旬在假。』卷七熙寧四年（一〇七一）作《答曾舍人》云：『某秋冬來，目足初可勉強，第渴淋不少減。』卷九熙寧四年《與顏直講》云：『所苦渴淋，自春發作，經此暑毒尤甚。』由上所引劄子、書簡可知，如本簡箋注〔一〕《與王龍圖》所云，自治平二年春首『得淋渴疾』以來，直至熙寧，歐一直飽受『淋渴』的折磨。淋，尿頻而滴瀝不止；渴，口乾（春案：原文誤作「干」），歐患有消渴症（今稱糖尿病），尿頻口乾、『眼目疼痛』、『腳膝細瘦』均顯此病症。淋渴或曰渴淋，當與消渴症有關。」

士大夫驚呼，莫不為朝廷而痛惜。至於不知命者，皆有疑於造物之工，況相知於道義，而久接於游從。念以身而莫贖，徒有淚而沾胸」（《文忠集》卷五十，頁383-384），他們之間「相知道義」、「久接游從」的情誼，正如《說文解字》定義的「金，五色金也，黃為之長。久薶不生衣，百鍊不輕，從革不韋」⁴⁴，並在「金」的領域中相互成就，相互補足，孕育出新的學術境界來，綻放出如金質般特有的光亮。

四 從《集古錄》銅器銘文的釋讀看歐陽脩與劉敞、楊元明的交會

那麼，歐陽脩「未始委僮奴」（〈與王深甫論世譜帖〉，《文忠集》卷六十九，頁550）親自蒐集的《集古錄》之作，根據蔡襄〈答歐陽永叔書〉所說：「蒙書以《集古錄序》見託，書之於石。《集古》之勤，且十八載，而得千卷，并包夷夏數千里，行歷周、秦、漢、魏以來數千百年。賢聖功業，賊亂事跡，往往史傳之外，證明偽謬……蓋辭其可辭，其不可辭者不辭也。如公之文與所尚，誠得附名篇末，以永其傳，茲其幸也，其敢辭焉？」⁴⁵可見其蒐集之勤，持續之久，跨越時空種族，產生的糾謬補缺效益，在時輩的評論中已然為「永其傳」的名山之作，而能助其竟功，蔡襄是辭也不敢推辭的。但歐陽脩是有自知之明的，對於自己不嫻熟的「金文」，他一向抱持著「君子之學有所不知，雖聖人猶闕其疑以待來者，蓋慎之至也」（〈唐顏勤禮神道碑〉，《文忠集》卷一百四十，頁429）的持慎態度，並再三致意「更俟識者辨之」（〈唐杜濟墓誌銘〉，《文忠集》卷一百四十，頁428）、「存之以俟博學者」（〈唐益州學館廟堂記〉，《文忠集》卷一百三十八，頁409），乃充滿著殷殷期盼博學者來解惑析疑。劉敞就是歐陽脩能解開金文之鑰的「識者」之一，也是最重要的銘拓分享者。很早以前，他們就常常在一起同賞古文物⁴⁶，至於《集古錄》所收藏的青銅器銘，也泰半都是從劉敞得來的，對於這點，歐陽脩是從來不晦言直陳出處的，譬如《集古錄跋尾》卷一著錄〈古敦銘〉三器「毛

⁴⁴ 〔東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標點本）》，頁709。

⁴⁵ 〔北宋〕歐陽脩撰，李之亮箋注：《居士外集》，《歐陽脩集編年箋注》，卷十九，頁332-333。〔北宋〕蔡襄：〈答歐陽永叔書〉，《端明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二十七，頁22-23。

⁴⁶ 〔北宋〕歐陽脩撰，李之亮箋注：《集古錄跋尾·集古錄目序》，《歐陽脩集編年箋注》，卷一百四十四，頁585箋注〔十四〕「病告中書」下有一段說：「又原本卷後補注云：『翰林學士吳奎，知制誥劉敞，祠部郎中、集賢校理江休復，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祖無擇，屯田員外郎、編修《唐書》梅堯臣，嘉祐四年四月六日于編修院同觀。范鎮景仁後至。後見真蹟，題此六人官職姓名。』」

伯敦」「龔伯敦」「伯庶父敦」，他在跋「毛伯敦」時就說：

右〈毛伯古敦銘〉。嘉祐中，原父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為永興軍路安撫使，其治在長安。原父博學好古（一作之），多藏古奇器物，能讀古文銘識，考知其人事蹟。而長安，秦漢故都，時時發掘所得，原父悉購而藏之。以予方集錄古文，故每有所得，必模其銘文以見遺。此敦原父得其蓋於扶風而有此銘。原父為予考按其事云：《史記》武王克商，尚父牽牲，毛叔鄭奉明水，則此銘謂鄭者，毛叔鄭也。銘稱伯者，爵也。史稱叔者，字也。敦乃武王時器也。蓋余集錄最後得此銘，當作〈錄目序〉時，但有〈伯冏銘〉、「吉日癸巳」字最遠，故序言自周穆王以來，敘已刻石，始得斯（一作此）銘，乃武王時器也。其後二銘，一得盨屋，曰〈龔伯尊彝〉，其一亦得扶風，曰〈伯庶父作舟姜尊敦〉，皆不知為何人也。三器銘文皆完可識，具列於左。（右真蹟）。⁴⁷

長安在歷史上是秦漢故都，出土的古文物多，劉敞因「博學好古」的學養愛好，因緣際會，才能「多藏古奇器物，能讀古文銘識，考知其人事蹟」，且是「必模其銘文以見遺」，饋餉同好，但歐陽脩是必須透過劉敞來理解金文的，此即「原父為予考按」的實情。關於這部分，前賢多也已談及，如馬劉鳳在〈歐陽修與《集古錄》〉中歸結出《集古錄》為「好友同襄共舉，給以多方幫助，其中劉敞（字原父）出力最多，如〈古敦銘〉、〈韓城鼎銘〉、〈叔高父煮簋銘〉、〈張仲器銘〉、〈前二漢器銘〉、〈前漢谷口銅甬銘〉等都是劉在長安做官時寄給歐陽脩的出土文獻的拓片。歐陽脩說：『余家《集古錄》，自周武王皆有者，多得於原父。』此外，〈終南古敦銘〉得於蘇軾，〈後漢殷阮君神祠碑〉得於施昌言，〈後漢天祿辟邪字〉得於謝景初，〈唐有道先生葉（春案：原文誤作『頁』）公碑〉得於蔡襄，〈唐顏魯公帖〉得於王子野，〈唐僧靈澈詩〉得於許元，〈十八家法帖〉得於薛期，〈王文秉小篆千字文〉得於楊南仲（春案：原文誤作『仲南』），〈晉賢七帖〉得於李丕緒，〈唐蔡有鄰盧舍那珉（春案：原文誤作「佛」）像碑〉得於韓昭文，〈唐中興頌〉得於李建中。歐陽脩感嘆道：『余所集錄，自非眾君子共成之，不能若此之多也。』⁴⁸也就是說，《集古錄》正表彰出一代文風雅範的最佳寫照！

⁴⁷ 〔北宋〕歐陽脩：《集古錄跋尾一》，《文忠集》，卷一百三十四，頁347。

⁴⁸ 馬劉鳳：〈歐陽修與《集古錄》〉，《江西圖書館學刊》2005年第4期，頁119。

當然，針對青銅古物的收藏暨金文的釋讀，也不僅出於劉敞而已，歐陽脩也盡全力採擷諸家所得，如以《集古錄跋尾一》所收〈韓城鼎銘〉來說，係「原甫既得鼎韓城，遺余以其銘」，但「太常博士楊南仲能讀古文篆籀，為余以今文寫之而闕其疑者。原甫在長安所得古奇器物數十種，亦自為《先秦古器記》。原甫博學無所不通，為余釋其銘以今文，而與南仲時有不同，故并著二家所解，以俟博識君子」（《文忠集》卷一百三十四，頁349-35）；或是跋〈古器銘（綏和鐘、寶盃、寶敦）〉也說：「右古器銘四，尚書屯田員外郎楊南仲為余讀之。其一曰〈綏和林鍾〉，其文磨滅不完，而字有南仲不能識者。……自余集錄古文，所得三代器銘，必問於楊南仲、章友直，暨集錄成書而南仲、友直相繼以死，古文奇字世罕識者，而三代器銘亦不復得矣。」（《文忠集》卷一百三十四，頁351），由此可見，青銅銘文的釋讀除劉敞外，尚藉助於楊南仲⁴⁹和章友直⁵⁰。另根據《集古錄跋尾一·秦度量銘》所云：「余之得此二銘也，迺在秘閣校理文同家。同，蜀人，自言嘗遊長安，買得（一有此字）二物，其上刻二銘，出以示余。其一乃銅鍏，不知為何器，其上有銘，循環刻之，乃前一銘也。其一乃銅方版，可三四寸許，所刻乃後一銘也。考其文與《家訓》所載正同，然之推所見是鐵稱權，而同所得乃二銅器。余意秦時茲二銘刻於器物者非一也。及後又於集賢校理陸經家得一銅版，所刻與前一銘亦同，益知其然也。」（《文忠集》卷一百三十四，頁355）所言，則秘閣校理文同⁵¹與集賢校理陸經，都是他的解讀人之一。而《集古錄跋尾

⁴⁹ 〔北宋〕歐陽脩撰，李之亮箋注：《集古錄跋尾》，《歐陽脩集編年箋注》，卷一百三十五，頁307，云：「楊南仲：以大理寺丞知國子監書學，嘉祐中，判尚書考功。」又卷一百三十四，頁529〈唐虞城李令去思頌〉注〔六〕「楊南仲」條云：「以大理寺丞知國子監書學，嘉祐中，判尚書考功。胡宿《文恭集》卷一四〈楊南仲大理寺丞知國子監書學兼篆石經制〉，嘉祐初制。王安石《臨川集》卷五一有〈楊南仲太常博士制〉，嘉祐末制。」另外《集古錄跋尾十》收〈文秉小篆千字文紫陽石磬銘附〉云：「文秉在江南，篆書遠過徐鉉，而鉉以文學名重當時，文秉人罕知者，學者皆云鉉筆雖未工而有字學，一點一畫皆有法也。文秉所書，獨余《集錄》屢得之，此本得於太學楊南仲。〈紫陽石磬銘〉者，張獻撰，亦文秉書也。」〔北宋〕歐陽脩：《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三，頁464，可同參。

⁵⁰ 章友直是宋仁宗時宰相章得象之族侄。王安石在〈建安章君墓誌〉云：「君諱友直，姓章氏。少則卓越，自放不羈，不肯求選舉，然有高節大度過人之材。其族人郇公為宰相，欲奏而官之，非其好，不也就。自江淮之上、海嶺之間，以至京師，無不遊。將相大人、豪傑之士，以至閭巷庸人小子，皆與之交際，未嘗有所忤，亦莫不得其懽心。卒然以是非利害加之，而莫能見其喜愠，視其心，若不知富貴貧賤之可以擇而取也，頽然而已矣。昔列禦寇、莊周當文武末世，哀天下之士沈於得喪，陷于毀譽，離性命之情而自託於人偽，以爭須臾之欲，故其所稱述，多所謂天之君子。若君者，似之矣。君讀書通大指，尤善相人，然諱其術，不多為人道之。知音樂、書畫、弈棋，皆以知名於一時。皇祐中，近臣言君文章善篆，有旨召試，君辭焉。於是太學篆石經，又言君善篆，與李斯、陽冰相上下，又召君，君即往。經成，除試將作監主簿，不也就。嘉祐七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于京師，年五十七。」〔北宋〕王安石：〈建安章君墓誌〉，《臨川文集》（臺北：世界書局，1985年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叢要），卷九十一，頁13-14。可見章友直是篆書高手，但沒有提到他跟青銅銘文與古器物的關係。

⁵¹ 〔南宋〕王稱：《東都事略》，卷一百一十五，頁13-14云：「文同，字與可，梓州梓潼人也。舉進士，稍遷太常博士、集賢校理，知陵州，又知洋州，最後知湖州。同以文學名，操韻高潔，畫筆尤妙。常與崔公度同為館職……同既死，蘇軾以文哭之曰：『孰能敦德秉義如與可之和而正乎？孰能養民厚俗如與可

一》收〈前漢鴈足鐙銘（此跋本與漢二器銘銅甬銘共為一卷）〉又提到〈裴如晦帖〉云：「（裴）煜頃嘗謂周、秦、東漢往往有銘傳於世間，獨西漢無有。王原叔言華州片瓦有元光字，急使人購得之，乃好事者所為，非漢字也。侍坐語及，公亦謂家集所闕西漢字耳。煜守丹陽日，蘇氏者出古物，有銅鴈足鐙，制作精巧，因辨其刻，則黃龍元年所造。其言『榮宮』，二史間未始概見，遂摹之，欲寄左右，以為《集古錄》之一事。會悲苦，不果。昨偶開篋見之，謹以上獻。亦聞原甫於秦中得西漢數器，不知文字與此類不？煜再拜。治平元年十二月十四日。」可見裴煜⁵²也是他蒐羅古銅器識讀銘文的同好共賞者，若再加上〈唐虞城李令去思頌（元和四年）〉所記載的徵詢對象「今世以小篆名家，如邵不疑、楊南仲、章友直」（《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一，頁445），則邵不疑也可能入列。若試以今律古，檢驗一番，那麼，劉敞所提供的青銅器與銘拓釋文無疑地數量最多，但若就質量言之，又是若何？我們知道，當歐陽脩無法判別各家釋讀的是非對錯時，會採取同時並陳，客觀呈現的方式，這讓我們有機會推敲各家辨識解讀青銅銘文的能力。而劉敞在歐陽脩的心目中屬「博學無所不通」的學者，能「為余釋其銘以今文」；但他並不滿足，又請了「太常博士楊南仲能讀古文篆籀，為余以今文寫之而闕其疑者」，可是面對兩者釋文的互有出入，他並無法仲裁定奪，只得「并著二家所解」，而期待「博識君子」來做解人的！

或許要比較當時學者辨識解讀青銅銘文的能力，當可擷取《集古錄》中同時並存的釋讀來試加檢證推敲，那麼，〈韓城鼎銘〉就是個絕佳首選，歐陽脩在《集古錄跋尾一·韓城鼎銘》（《文忠集》卷一百三十四，頁349-350）中云：

原甫既得鼎韓城，遺余以其銘，而太常博士楊南仲能讀古文篆籀，為余以今文寫之而闕其疑者。原甫在長安所得古奇器物數十種，亦自為《先秦古器記》。原甫博學無所不通，為余釋其銘以今文，而與南仲時有不同，故并著二家所解，以俟博識君子，具之如左：（右真蹟）。

可見《集古錄跋尾一·韓城鼎銘》兼存劉敞及楊南仲的釋文，而兩者略有不同，

之寬而明乎？孰能為詩與楚辭如與可之婉而清乎？孰能齊寵辱得喪如與可之安而輕乎？」同號石室先生，有《丹淵集》四十卷行於世。」

⁵² 〔北宋〕歐陽脩撰，李之亮箋注：《集古錄跋尾》，《歐陽脩集編年箋注》，卷一百三十五，頁330。〈前漢鴈足鐙銘〉箋注〔二〕云：「裴如晦：裴煜，字如晦，江西臨川人。慶曆六年進士。萬曆《揚州府志》卷七秩官題名：『治平間知揚州，裴煜。』王鏊《姑蘇志》卷三郡守題名：『裴煜，治平二年九月丁未，以開封府提刑除秘閣校理，知蘇州，三年九月己丑，入判三司都磨勘司，替沈扶闕。』」可參。

正可比觀論略，稍評得失。且觀劉敞的釋文作⁵³：

惟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惟司朕先姑君晉邦。余不○安寧，丕離明德。宣○我猷，用○所辭辟。○○○○剿，虔不○。○○○呂，寵我萬民。嘉遺我，錫鹵賚千兩，今灋文侯○○，○○○○，征綏○、○，堅久吉金，用作寶尊鼎。用康輿妥懷遠邦君子。晉姜用蕝○○康壽，作惠○亟，萬年無疆，〔用享〕（春案：闕釋）用德，峻保其孫子，三壽是利。




































至於楊南仲的釋文，歐陽脩有誌其源起說：「右嘉祐己亥歲，馮掖有得鼎韓城者，摹其款識于石。樂安公以南仲職典書學，命釋其字」，而釋文則是「嘉祐壬寅冬十月，大常博士知國子監書學豫章楊南仲識」，釋文作：

隹（惟）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隹（惟）司（嗣享同）朕先姑君晉邦。余不𠄎（𠄎，今作敢者，籀文省）妄寧，丕（經）𠄎（離）明德。宣祁（疑邶省，隸作卹）我酬，用𠄎𠄎辟辟。𠄎（疑即母字）𠄎久光剿，虔不𠄎（疑遂字，讀為墜）。𠄎（諸）𠄎（覃）（享享）呂（帥），𠄎我萬民。𠄎遺我，𠄎（疑易字），𠄎（𠄎或胃字省）賚千兩，勿灋文侯額令，畢（疑卑字）𠄎（疑𠄎字，讀為貫）循（通）𠄎，征𠄎（疑𠄎字）湯、𠄎，𠄎（受）久吉金，用𠄎（作）寶𠄎（𠄎）鼎。用康輿（疑西夏字）𠄎（妥讀為綏）𠄎𠄎切君子。晉姜用𠄎（疑𠄎字讀為祈）𠄎𠄎𠄎（疑𠄎字，讀為眉𠄎），𠄎𠄎𠄎（為）亟（極），萬季無疆（疆），用𠄎（享）用德，𠄎（疑允字）保𠄎（其）孫子，三𠄎是𠄎。

楊氏並進一步詳細解說道：

其銘蓋多古文奇字，古文自漢世知者已稀，字之傳者賈逵、許慎輩多無其說。蓋古之事物有不與後世同者，故不能盡通其作字之本意也。其不傳者，今或得於古器，無所依據，難以臆斷。大抵古字多省偏旁而趣簡易，故隹、司、丕、呂、𠄎等字，皆假借也。鄭司農說《周禮》云：「古者書儀但為義」，又云「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者是也。

⁵³ 釋文原無句讀，此依馬承源《商周青銅器銘文選》標註。

𡗗者，進取也，从受，故𡗗疑為𡗗。 (母)从女而象乳子形，故疑𡗗為母。而𡗗讀為𡗗。𡗗用邕聲，邕從𡗗，古文作，今此𡗗从水从呂，故疑為𡗗。魯字古作 (即旅字)，古文旅作而 (者)，字用為聲，蓋古文魯、旅、者三字通用，故𡗗疑為諸。易者，篆文象蜥易形，故疑為易而讀為錫、為賜，皆以聲假借也。鹵从鹵(古西字)，中象鹽形；胃(胃)，上象胃中穀形，故、胃二字〔通〕(春案：「通」為補字)。卑者，从在甲下(今但用左，古者尚右，故在甲下為卑)，故疑為卑(亦恐借為卑讀)。毌(音冠)，象穿寶貨形，貫字从之，毌或即毌字，今《毛詩》有串夷字，俗用為串穿之串，而《說文》不載，豈非毌字之省也，故疑毌讀為貫。通从，凡从 (春案：以上二「」字均誤作「」，據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改)、彳之字多通用，故疑為通。古語二字相屬者，多為一字書之，若〈秦鍾銘〉有 (小子)、 (四方)之字是也；鹵，古西字，故疑為西夏字(〈秦鍾銘〉亦有此字)。𡗗字《說文》無之，蓋古𡗗字省，系其後相承，讀如嬌，故疑讀為𡗗。𡗗(音偃)，石鼓文皆作為古之旌旂，悉載於車，故疑即旂字，而从車，借讀為祈，近嘗有得敦藍田者二銘，皆有用萬之文，故知然也。𡗗，今幅為許刀而𡗗芭之𡗗(音門)，用之為聲，《詩》「鳧鷖在𡗗」，又省為𡗗，《易·繫辭》又讀如尾，𡗗(門)、尾、眉聲相近，又古者字音多與今異(徐鉉所謂如皂亦音香，𡗗亦音門，乃亦音仍，它皆倣此是也)，豈𡗗、眉古亦同音歟？〈秦鍾銘〉亦有字，故疑為眉。為者，母猴也，从爪而象其形，故為為。，字字書所無，而於文執宜為允，蓋用省聲也。它字不可識者，猶十一二，與其偏旁之異者，若、、、、之類，皆今所不傳，以小篆求之不能彷彿，以今揆之，其間或當時書者、鑄器者，不必無謬誤矣，姑盡淺學以塞公命云尔。

嘉祐壬寅(1062)冬十月，大常博士知國子監書學豫章楊南仲識。⁵⁴

按前引王稱《東都事略》已說劉敞「在長安，得先秦古器數十，愛其款識文字奇古，因以考知三代制度與先儒所說不同者」，是劉敞不僅能釋讀，且能加予應用。況劉敞學問淵博，《宋史》描述他「學問淵博，自佛老、卜筮、天文、方藥、山經、地志，皆究知大略」，但也不忘述及「嘗得先秦彝鼎數十，銘識奇奧，皆案

⁵⁴ [北宋]歐陽脩：《集古錄跋尾一》，《文忠集》，卷一百三十四，頁349-350。

而讀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尤珍惜之。每曰：『我死，子孫以此蒸嘗我。』朝廷每有禮樂之事，必就其家以取決焉。」得到朝廷相當地倚重和信賴，且是歐陽脩十分重要的諮詢對象：「歐陽脩每於書有疑，折簡來問，對其使揮筆，答之不停手，脩服其博」⁵⁵，「學彊而博，識敏而明」已然成為劉敞的標誌，而他識見的獨到，興趣的博雅，鼓盪起宋代收集古器物的浪濤，煽起風潮，產生蝴蝶效應以致影響深廣；至於楊元明的釋讀，歐陽脩並沒有直接跟他接觸，而是透過「樂安公以南仲職典書學，命釋其字」而來的，但由劉、楊二氏不同的隸定，試取今之研究成果如《殷周金文集成》⁵⁶、馬承源《商周青銅器銘文選》⁵⁷以及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⁵⁸稍作比較（見下表一），舉一反三，似可推知兩人在青銅銘文釋讀方面的高下優劣，其輪廓也較清晰地勾勒出來了。

表一 〈韓城鼎（晉姜鼎）銘〉之劉、楊異文與今人釋讀對照表

《集古錄跋尾》			現代隸定		
銘文	劉 敞	楊南仲	《集成》	馬承源	吳鎮烽
	○	叀（叀今作敢者，籀文省）	段	段／暇	段／暇
	妄	妄	妄	妄	妄／荒
	○	邛（疑邛省隸作邛）	邛	□	邛
	○	𠂔	𠂔	𠂔／召	𠂔／紹
	所	𠂔	匹	匹／弼	匹
	辭	𠂔	𠂔／台	𠂔／予	𠂔／台
	○	每（疑即母字）	每	每／每／敏	每／敏
	○	𠂔	𠂔／揚	揚	𠂔／揚
	○	久	𠂔／厥	𠂔	𠂔／厥
	○	光／光	光	光	光
	𠂔	𠂔	𠂔／烈	𠂔／烈	𠂔／烈
	○	𠂔（疑遂字，讀為墜）	𠂔／弛	𠂔／墜	𠂔／墜

⁵⁵ 〔元〕脫脫等撰：《劉敞傳》，《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卷三百一十九，頁10387-10388。







⁵⁶ 《殷周金文集成》02826「晉姜鼎（韓城鼎、乙亥鼎）」，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網址：<http://bronze.asdc.sinica.edu.tw/rubbing.php?02826>，瀏覽日期：2019年11月12日。

⁵⁷ 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4月），第四卷，頁585-586。

⁵⁸ 吳鎮烽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9月），第五冊，頁371-372。

《集古錄跋尾》			現代隸定		
銘文	劉 敞	楊南仲	《集成》	馬承源	吳鎮烽
諸	○	譚（諸）	諸	魯	魯
覃	○	覃（覃）	覃	覃	覃
京	○	京（享）	京／京	京	京／京
白	呂	白（帥）	白／師	白／師	白／師
髀	寵	髀	髀／叉	髀／叉	髀／髀
嘉	嘉	嘉	嘉	嘉	嘉
遣	遣	遣	遣	遣	遣
錫	錫	錫（疑易字）	錫／賜	易	錫／賜
鹵	鹵	鹵（鹵或胃字）	鹵	鹵	鹵／鹵
賁	賁	賁	賁／積	賁／積	賁／賁
勿	勿	勿	勿	勿	勿
觀	○	觀	觀／景	觀	觀／景
令	○	令	令	令	命
卑	○	卑（疑卑字）	卑	卑	卑／卑
貫	○	貫（疑田字，讀為貫）	貫	貫／貫	貫
通	○	通（通）	通	通	通
孔	○	孔	□	孔	□
鯀	○	鯀（疑鯀字）	鯀	鯀	鯀
湯	○	湯	湯	湯	湯／湯
雕	○	雕	雕	雕	雕
取	堅	取（受）	取	取	取
𠂔	久	久	𠂔／厥	𠂔	𠂔／厥
𠂔	𠂔	𠂔（疑西夏字）	𠂔／柔	𠂔／擾	𠂔／揉
妥	妥	妥（妥讀為綏）	妥／綏	妥／綏	妥／綏
懷	懷	懷	懷／懷	懷／懷	懷／懷
遠	遠	遠	遠	遠	遠
邇	邦	邇	邇／邇	邇／邇	邇／邇
綽	○	綽	綽	綽／綽	綽／綽
綽	○	綽	綽	綽／綽	綽／綽

《集古錄跋尾》			現代隸定		
銘文	劉 敞	楊南仲	《集成》	馬承源	吳鎮烽
	麋	 (疑麋字讀為眉)	費／眉	眉	麋／眉
	作		作	乍	作
	惠		憲	憲	憲
	○	為	為	為	為
	(二字闕釋)	用享	用享	用享	用享
	峻	眈 (疑允字)	眈／峻	眈	眈／峻

在上舉的三十九字銘文釋讀差異中，劉氏所釋「辭」、「嘉」、「錫」、「鹵」、「妥」、「懷」、「遠」、「作」、「峻」九字合於今人釋讀；至於楊氏則有「妄」、「辟」、「光」、「墜」、「譖（諸）」、（覃）、「白」、「臂」、「遣」、「易」、「賁」、「勿」、「令」、「卑」、「貫」、「通（通）」、（繇）、「湯」、「（妥／綏）」、、「（麋眉）」、「（𠂔）」、「為」、「用享」、「眈」二十六字與今人釋讀相同，可見楊南仲的確不愧「大常博士知國子監書學」的頭銜職守，他在洪荒初闢，「無所依據，難以臆斷」的金文學伊始，除採用「小篆」字形去推察「求之」外，也利用一些文字學上的規律來加予印證，如說「大抵古字多省偏旁而趣簡易，故佳、司、亼、白、𠂔等字，皆假借」即是，或是利用音讀、詞例去推勘，也因如此，他就較劉敞取得更好的釋讀成績了。

五 結語：「合眾美為己用，超倫類而獨得」

學問有時不能孤立獨至，劉敞曾在〈奉和永叔夜聞風聲有感用其韻〉推崇歐陽脩是「夫子文章伯，已在青雲端」。（《公是集》卷九，頁159）可見歐陽脩在他心目中拔聳入雲的崇高地位；而歐陽脩也欣羨劉敞少年英發才情無敵（「羨君年少才無敵」，〈奉和劉舍人初雪〉，《文忠集》卷五十七，頁436）。兩人的磁吸海納，場域共振下，為金文學開疆闢土，醞釀出新蜜，濡沫之誼，正如《集古錄跋尾一·張仲器銘》中表露的：「嘉祐中，原父在長安獲二古器於藍田，形制皆同，有蓋而上下有銘」，並說：「原甫藏其器，予錄其文。蓋仲與吾二人者相期於二千年之間，可謂遠矣。方仲之作斯器也，豈必期吾二人者哉，蓋久而必有相得者，物之常理爾。是以君子之於道，不汲汲而志常在於遠大也。原甫在長安得古器數十，

作《先秦古器記》。而張仲之器其銘文五十有一，其可識者四十一，具之如左，其餘以俟博學君子。」（《文忠集》卷一百三十四，頁354）映現出兩人興好情誼的交融互補，將箇中的留白細縫填塞，共盼那流傳「遠大」的心志可以實現，加上當時「精篆、楷、金石，宋代金石學領域辨識古文字第一人」（王國維《宋代之金石學》）的楊南仲鼎力相助，使得這摻和著理性和感性成分所綻放的嶄新奇葩格外引人注目。在種種機緣的媒合下，才能「合眾美為己用，超倫類而獨得」，既含藏有歐陽脩放得下身段，解開他文壇領袖的盟主姿態，虛懷若谷、廣納博求⁵⁹、不憚求人，在洪荒初闢，不辨東西的時候，持守著「不知為不知」的客觀審慎態度，雖對金文「所涉不深」，也不亂猜謎射覆，做無謂的解說，使得治絲益棼，岔入歧途，此時雖或主客易位，他也不會強不懂以為懂，而維護住學術的獨立和尊嚴。這種堅持「不知為不知」的如實態度，等待適宜的解人，也給後人立下了典範，亦即他自道的：「君子之學，有所不知，雖聖人猶闕其疑以待來者。」以故在《集古錄》中不斷出現的「姑志其語，以俟知者」（〈唐裴公紀德碣銘〉，《文忠集》卷一百四十，頁434）、「第錄此碑，以俟識者」（〈唐王師乾神道碑〉，《文忠集》卷一百四十，頁435）、「故存之以俟識者」（〈唐李藏用碑〉，《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二，頁450）、「二家之本大體則同，而文有得失，故並存之，覽者得以自擇焉」（〈唐玄度十體書〉，《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二，頁450）也就可以理解了。

當然，歐陽脩集錄前世遺文編撰《集古錄》，是有三個目的：一是考訂歷史，正謬補闕；二是保存史料，傳於後世；三是娛樂休閒，把玩欣賞。⁶⁰這三個目的的起始點都涉及到文字，但金文大多形成於先秦，青銅器本身又因時空環境因素而腐蝕鏽跡不堪，其文字又佶屈聱牙，相當不容易釋讀⁶¹，加上摹寫失真，筆畫失準的介入，即連「小歐公十二歲，學識淵博，尤長於《春秋》學，為歐所敬重」⁶²的劉敞，他「談經，雖好與先儒立異，而淹通典籍，具由心得，究非南宋諸家游談無根者比，故其文湛深經術，具有本原」⁶³，是個「淹通典籍」、學養相當深厚的學者，接觸青銅器也相當早，如《公是集》卷一〈秦昭和鐘賦·序〉

⁵⁹ 李興祥：〈由《集古錄》看歐陽脩之治學精神〉，《時代文學》2009年第4期，頁143說：「他從不盲目下結論，對自己不確信或不擅長之處，積極向專家請教，廣搜兼採。《集古錄》中所記他請教過的學者就有劉敞、楊南仲、句中正、章友直等，對於他們意見不統一之處就並列之，以待後人自己判斷……對於不能判斷的材料，他能以『並存之以俟來者』的謙遜態度，寧可闕疑也不逞妄，使此書有了更高的可信度。」

⁶⁰ 馬劉鳳：〈歐陽修與《集古錄》〉，《江西圖書館學刊》2005年第4期，頁119。

⁶¹ 朱伶杰：〈《集古錄跋尾》的編纂及其體現的思想研究〉，《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6期，頁155。

⁶² 〔日〕東英寿考校、洪本健箋注：《新見歐陽脩九十六篇書簡箋注》，頁62-63。

⁶³ 〔北宋〕劉敞：《公是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景印國家圖書館藏文津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三六六冊，頁134。

說：「祕閣有〈秦昭和鐘〉，形制絕異。其始得諸幽雍之間。其銘首曰『不顯朕皇祖十有二公』云云，其藏于冊府久矣，余因為之賦。」是「直集賢院作」，內有「彼僻陋之小國，曾著作之絕工。非以其銘祖考之休烈，交神人之肅離者哉」，「詢款識之尚傳兮，邈沮頡之遺跡。世行隸之趨俗兮，又雖久而不覲。」⁶⁴或是在《公是集·和永叔寒夜會飲寄江十》詩云：「豈意二三子，復為今夕歡。主人文章伯，談道輒忘倦。每至絕倒處，恨不使君見。鳥跡上古書，龍頭冢中器。」自注云：「永叔出所收古文碑碣及龍頭銅鎗示客，以張飲興也。」（《公是集》卷十二，頁167）可見平日與友朋聚會觀摩談論的情景。又如〈招鄰幾聖俞和叔于東齋飲觀孔雀白鸚及周亞夫玉印赫連勃勃龍雀刀辟邪宮璽數物又使女奴奏伎行酒聖俞首示長篇因而報之〉（《公是集》卷十二，頁168）、〈雷氏子推跡石鼓為隸古定聖俞作長詩敘之諸公繼作予亦繼其後〉（《公是集》卷十七，頁182）詩所示，亦是數人同觀古物的寫照。〈麻黃州送李斯石銘二十一字〉詩云：「君不見夏禹九鼎傳三王，末年乃隨殷社亡。時平往往暫一見，龍文玉鉉曾無傷。聖賢作事宜萬代，事非聖賢多立壞。」（《公是集》卷十六，頁178）而透過〈雷氏子推跡石鼓為隸古定聖俞作長詩敘之諸公繼作予亦繼其後〉詩所示，約可略窺劉敞的文字學知識，詩云：

結繩既亡書契出，文字變化猶忽忽。太山七十有二代，遺事昏昏萬無一。岐陽石鼓起晚周，宣王之詩史籀筆。天下金石凡幾存，此當為甲拔皆乙。體勢鳥跡雜蝌蚪，詞章車工與吉日。六書既廢小雅缺，能使兼存此其實。韓公昔嘗歌感激，若弦周詩播琴瑟。雷生今復隸古定，如破魯壁傳簡帙。道之難行乃若茲，二千年間能事畢。先王親用必貴本，流俗玩文因喪質。此雖於今似不急，豈不班班見儒術。藏之天府自其所，大訓河圖亦何物？會稽群玉久冥冥，漆簡韋編尚髣髴。昔人雖死名不朽，智者能為巧當述。太學先生事起廢，誦此勤勤就埋沒。會令永興天壤傳，不比九誥俄然失。

從詩歌的刻畫中可明顯感受到劉敞與周遭友朋間的同氣相求，如與「我家江南再世前，與君通家情有連」（〈同永叔哭聖俞〉，《公是集》卷十八，頁184）的梅聖俞；如在〈劉涇州以所得李士衡觀察家寶硯相示與聖俞玉汝同觀戲作此歌〉，個中就透露出其辨贗求真的方法：「李侯寶硯劉侯得，上有刺史李元刻。云是天寶八年冬，端州東溪靈卵石。我語二客此不然，天寶稱載不稱年，刺史為守州為郡。

⁶⁴ 〔北宋〕劉敞：《公是集》，集部·別集類，第三六六冊，頁135。

此獨云爾奚所傳，兩君盧胡為絕倒。嗟爾于人幾為寶，萬事售偽必眩真，此固區區無足道。」（《公是集》卷十八，頁185）或是在〈和府公觀劉團練寶刀詩〉下注：「此刀新羅所貢，上以劉正光為珎珎鏤琫，制作絕巧也。」（《公是集》卷十八，頁185）或是〈與聖俞、君章、樞言、持國飲，因以太公大刀、王莽錯刀示之〉下注：「大刀長五寸半，闊一寸，正為刀形，鑄作絕精巧。其面有古文三字：上一字可曉，曰『齊』；下二字不可曉。其背為圓法。錯刀長二寸，厚四分，金錯篆文兩字：上曰『一』，下曰『刀』。又其下曰『平五千』。沂州民鑿地破古塚獲之，各數十百枚，稍為好事者購取。王公和守沂州，求得數枚，以其一遺予。」（《公是集》卷十八，頁185）目睹千年遺物不禁感慨繫之：「邇來上下各千歲（下注：自太公至新室千歲，自新室至今亦千歲），何異俛仰須臾間。」（《公是集》卷十八，頁185）而當時工程進行中，時時也會有銅器的出土，如《公是集·鼎池》詩下序云：「前太守鑿此池，深八、九尺得銅鼎，受一斗餘。肩蓋如新，鼎下有物如藥，青紫色，役人不知，守取去。或云是金鼎，予因號『鼎池』。」故詩云：「丹成雞犬去，鼎在陵谷遷」（《公是集》卷二十七，頁211），然其時代未明，或屬術士煉丹所用的金鼎。或如當世皇帝敕「立鐘律」，「興神鼎、鸞刀奏事郊廟」而撰〈進四銘表〉，下注：「律、鐘、鼎、鸞刀。」〈表〉云：「古者作器必銘，銘之義，天子合德。臣幸得召赴崇政殿，從士大夫之後，周旋器寶之側，目睹其狀，耳聞其聲，竊不勝其愚，謹獻律、鐘、鼎、鸞刀之銘四章，以發明令德之指，而庶幾不朽之地。揚子雲曰：『銘哉銘哉，有益于慎。』臣以子雲為知言也。」（《公是集》卷三十四，頁232）都是劉敞接觸古銅器的載記。

《公是集·先秦古器記》中說：「先秦古器十有一物，制作精巧，有款識，皆科斗書，為古學者莫能盡通，以他書參之，迺時得五六。就其可知者校其世，或出周文武時，于今蓋二千有餘歲矣！嗟乎！三王之事，萬不存一，《詩》《書》所記，聖王所立，有可常太息者矣，獨器也乎哉！兂之戈，和之弓，離磬崇鼎，三代傳以為寶，非賴其用也。亦云上古而已矣，孔子曰：『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眾不可概，安之天下無能盡辨之者哉？使工模其文，刻于石，又并圖其象，以俟好古博雅君子焉！終此意者，禮家明其制度，小學正其文字，譜牒次其世諡，迺能為盡之。」（《公是集》卷三十六，頁240）此文涉及《先秦古器記》中所收藏品的數量、質地、文字的有無與辨識、書體、年代、著錄與功用，概括了當時對出土銅器的處理與認知；或是《公是集·張仲簠贊（并序）》作：「右二簠得于驪山白鹿原。簠者稻梁器。其銘曰『張仲』云云，張仲見于〈小雅〉，宣王臣也，所謂「張仲孝友」者矣。籀書奇字不能盡識，當有能辨者。贊曰：宣治中興，方

虎董征。張仲孝友，秉德輔成。或外是經，或內是承。文武師師，安有不寧。」（《公是集》卷四十九，頁281）也先明其出土地，再及器用與銘文內容，並透過經籍比勘以追索其年代，並承認自己對銘文「籀書奇字不能盡識」，留存下來以待「當有能辨者」，其不強索知解的態度一如歐陽脩，真個志同道合，所謂：「非學之難，知所學之難也。非所學之難，知道之難也。非知道之難，知道行之難也。」⁶⁵劉敞與歐公在追求金文釋讀的道途中攜手同行，開創另一番天地，並轉化了自己抑鬱失志的孤懷寂情矣！此不正呼應了其弟劉放（在〈公是先生集序〉）所言：「古今之文人多矣！其能道胸中之蘊積，暢物理之有無，合眾美以為己用，超倫類而獨得，使其語言如其心馳騁極所欲，瓌偉奇曄，放肆自若，非夫豪傑之士不能至是」，「是好古博物之士，所以貴乎學聖人而得道真者」⁶⁶乎？

至於歐陽脩在《居士集五·答原甫（一作答劉廷評）》所感慨的「嗟予學苦晚，白首困鉛槧。危疑奚（一作何）所質，孔孟久已窆。群儒窒自私，惟子通且瞻。幸時丐贏餘，屢得飽飢歉」、「聞見患孤寡（一作陋），是非誰證驗。嘗欣同好惡，遂乞指瑕玷」（《文忠集》卷五，頁52），其實也適用在楊元明的身上，他不愧書學博士的美譽，在金文釋讀的專業上，環繞著歐公群賢可謂無人能出其右。無論如何，在北宋時期鋪展開這場文化史上的盛宴，既浸染著歐公豪情萬丈的高度，也包藏著那谷虛海涵的厚度，而群英薈萃，有軟性的感興，有硬性的知解，才能蘊育出這欣欣生意的新機矣！

參考文獻

一 專書

王宏生：《北宋書學文獻考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3月。

王國維、羅福頤編撰：《三代秦漢兩宋（隋唐元附）金文著錄表》，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2003年9月，頁3；頁627。

〔日〕白川靜：《金文通釋》5，《白川靜著作集 別卷》，東京：株式會社平凡社，2005年4月，頁61。

何澤恆：《歐陽修之經史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80年6月，文

⁶⁵ 〔北宋〕劉敞：《公是先生弟子記》，叢書集成初編，頁8。

⁶⁶ 〔北宋〕劉敞：〈公是先生集序〉，《彭城集》，集部·別集類，第三百六十六冊，卷三十四，頁410。

史叢刊之五十四，頁183-184。

吳鎮烽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9月，第五冊，頁371-372。

李慧斌：《宋代制度視閥中的書法史研究》，海口：南方出版社，2011年11月。

李憲專：《歐陽脩《集古錄跋尾》所記金石碑帖書法之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8年12月。

〔日〕東英寿考校、洪本健箋注：《新見歐陽脩九十六篇書簡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6月，頁16-17；頁29-30；頁62-63；頁93-94。

〔日〕林巳奈夫著，廣瀨薰雄等譯，郭永秉潤文：《殷周青銅器綜覽·第一卷·殷周時代青銅器之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5月，頁7。

林尹、高明主編：《中文大辭典（第一次修訂版普及本）》，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90年9月，第一冊，頁735。

徐無聞主編：《甲金篆隸大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1年7月，頁253、540、213。

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4月，第四卷，頁585-586。

陳芳妹：〈導言〉，《青銅器與宋代文化史》，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5月，頁Ⅲ。

隸書大字典編纂組：《隸書大字典》，臺北：宏業書局，1975年8月，頁28。

顧永新：《歐陽修學術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8月，頁186-192。

二 論文

（一）期刊論文

王宏生：〈《集古錄》著錄、流傳與版本研究〉，《淮北煤炭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4期，頁35-36。

〔日〕白川靜：〈金文通釋〉，《白鶴美術館誌》第四一輯，第二章，頁61。

朱伶杰：〈《集古錄跋尾》的編纂及其體現的思想研究〉，《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6期，頁155。

李慧斌：〈宋仁宗時期國子監書學楊南仲考述〉，《青島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期，頁70。

李興祥：〈由《集古錄》看歐陽脩之治學精神〉，《時代文學》2009年第4期，頁

142-143。

馬劉鳳：〈歐陽修與《集古錄》〉，《江西圖書館學刊》2005年第4期，頁119。

（二）學位論文

李慧斌：《宋代制度層面的書法史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頁133。

李憲專：《歐陽脩《集古錄跋尾》所記金石碑帖書法之研究》，彰化：明道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5年。

杜 娟：《歐陽修《集古錄跋尾》研究》，濟南：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

梁 豔：《歐陽修書論研究——以〈集古錄跋尾〉為中心》，長春：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

莊清嘉：《自適、載道與歎逝：歐陽修《集古錄跋尾》之抒情性》，臺北：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

蔡清和：《歐陽脩《集古錄跋尾》之研究——以書學、佛老學、史學為主》，嘉義：中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2年。

三 古籍

〔東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標點本）》，臺北：藝文印書館，2005年10月，頁231-232；頁709。

〔南朝梁〕顧野王：《宋本玉篇》，北京：中國書店，1983年9月，卷一，頁37。

〔北宋〕王安石：〈建安章君墓誌〉，《臨川文集》，臺北：世界書局，1985年景印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十一，頁13-14。

〔北宋〕劉 放：《彭城集》，集部·別集類，第三百六十六冊，卷七，頁320。

〔北宋〕劉 放：〈同原甫詠秘閣詔藏古器圖〉，《彭城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景印國家圖書館藏文津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三百六十六冊，卷十一，頁332。

〔北宋〕劉 放：〈與青州歐陽尚書別紙〉，《彭城集》，集部·別集類，第三百六十六冊，卷二十七，頁390。

〔北宋〕劉 放：〈公是先生集序〉，《彭城集》，集部·別集類，第三百六十六冊，卷三十四，頁410。

- 〔北宋〕劉 旼：〈故朝散大夫給事中集賢院學士權判南京留司御史臺劉公行狀〉，《彭城集》，集部·別集類，第三百六十六冊，卷三十五，頁417。
- 〔北宋〕劉 敞：《公是先生弟子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叢書集成初編，頁8；頁41-42。
- 〔北宋〕劉 敞：《公是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景印國家圖書館藏文津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三六六冊，頁134；頁135。
- 〔北宋〕歐陽棐：〈集古錄日記〉，〔北宋〕歐陽脩：《集古錄》，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景印國家圖書館藏文津閣四庫全書，頁1-2。
- 〔北宋〕歐陽脩：《文忠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三十五，頁281；卷一百四十八，頁520；卷一百四十三，頁464；卷一百四十八，頁517；卷一百四十八，頁520。
- 〔北宋〕歐陽脩：《居士集》，《文忠集》，卷八，頁77。
- 〔北宋〕歐陽脩：《居士集三十五·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文忠集》，卷三十五，頁280-283。
- 〔北宋〕歐陽脩：《居士外集》，《文忠集》，臺北：世界書局，1985年景印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十八，頁6；卷六十八，頁543。
- 〔北宋〕歐陽脩：《集古錄跋尾一》，《文忠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一百三十四，頁347；卷一百三十四，頁349-350；卷一百三十七，頁393-394。
- 〔北宋〕歐陽脩撰，李之亮箋注：《居士外集》，《歐陽脩集編年箋注》，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12月，卷十八，頁302-303；卷十九，頁332-333。
- 〔北宋〕歐陽脩撰，李之亮箋注：《集古錄跋尾·集古錄目序》，《歐陽脩集編年箋注》，卷一百三十四，頁297-298；卷一百三十四，頁484；卷一百三十五，頁307；卷一百三十五，頁330；卷一百三十四，頁529；卷一百四十四，頁585。
- 〔北宋〕蔡 襄：〈答歐陽永叔書〉，《端明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二十七，頁22-23。
- 〔南宋〕王 稱：《東都事略》，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七十六，頁1-4；卷一百一十五，頁13-14。
- 〔南宋〕朱 熹著，郭濟、尹波點校：〈題歐公〈金石錄序〉真跡〉，《朱熹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卷八十二，頁4214。

〔元〕脫 脫等撰：〈劉敞傳〉，《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卷三百一十九，頁10387-10388。

〔明〕梅膺祚：《字彙》，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1年6月，亥集·高部，頁557。

〔清〕顧藹吉：《隸辨》，李學勤主編：《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三十九冊，卷六，頁33，總頁628。

四 網站

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網址：<http://bronze.asdc.sinica.edu.tw/rubbing.php?02826>，瀏覽日期：2019年11月12日。